

萬 有 文 庫

第 二 集 七 百 種

王 雲 五 主 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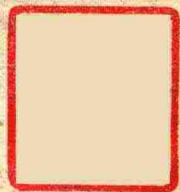
德 國 國 社 黨 史

(三)

郝 登 著

林 孟 工 譯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德國國社黨史

(三)

著 登 郝

譯 工 孟 林

著 名 界 世 譯 漢

第六章 一九二四年

一 希特勒有逃避之權嗎

在大體上批評希特勒這次暴動，我們可以說：工作做得不好。第一個錯誤是在於未有充分的準備便輕易發動，第二個錯誤是在於不十分注意國防軍首領的心理，第三個錯誤是在於十一月九日那天缺乏了勇氣。即是如羅姆那樣勇敢的軍人，也自願受敵人的包圍，爲的是他沒有向他的同伴開射機關槍的決心。魯登道夫是毫不願意用武力鬪爭的，他祇想用迷惑的手段。在大隊未動搖時候，希特勒本人也神志不定，對他道：『他們向我們開槍呢！』魯登道夫祇有用英雄的而且是輕率的口吻回答他道：『我們前進吧！』

在暴動發生後，我們曾發現慕尼黑的人民似曾有出來參加的準備。繼續在兩天之中，情緒激

昂的人民，奔馳街上，唾國防軍兵士的面頰，威嚇嘉爾的各處辦公廳，搗毀穩健派的報館，並且口裏喊道：『打到漢奸！』警察雖揮動警棍彈壓他們，但終是無效的。幾千學生在大學校裏面騷動，侮辱嘉爾；校長向他們勸解，幾乎被從樓上推下來；愛拉爾特勸告他們安靜，也受到他們的怒罵。

有着這麼熱心擁護的人民做後盾，他們總可以做出偉大的事業呀！然而這卻在於鬪爭大同盟應當努力奮鬥——照牠自己的名稱是應當那麼做的——而不應當遇到頭幾響槍聲便撒手。在這個時候，每個賺來的鐘頭都要減削了處於仇視的民衆包圍之中的政府的地位，這批民衆勇敢而無所用地繼續他們的示威運動歷兩天之久，而各領袖那時卻躲於安全的地點了。

這與共產黨叛徒在漢堡，在柏林，在慕尼黑，在德國中部，所做一番興高彩烈的舉動，有什麼差別呢？鬪爭大同盟的各當事人，竟然不管魯登道夫單獨對着警察的槍口前進，與伯蘭團體首領衛柏博士在整個一鐘頭中悽愴流淚，而希特勒卻頭一個坐汽車逃走，並不顧到他的部下各人。

我們可以替失敗者解釋說，在那個時候，他們大多數都以爲魯登道夫是死掉了。這可以作爲他們喪失銳氣的解釋，但總不能解釋希特勒的逃遁，他本人原應覺有現在單獨站在那邊指揮之

必要呢。

後來，鬪爭大同盟各領袖，爲替自己辯護起見，再三說明德國人不應當開槍射擊德國人。然而在魯爾或是當推翻慕尼黑共產主義共和政府時代，何以同樣的行動是被認爲應當的，何況那時是向徒手的民衆下這個手段呢。這是說，在他們心中，革命的鬪爭祇可在各階級之間發生，換句話說，在各層的人民之中，自以爲——不管有道理無道理——是彼此仇視的。在腓德赫恩前面的死者之中，僅有了四個工人；其他的是商人、銀行職員與退職軍官。

不過，這天流血的日子，乃是國社黨之幸運的日子。牠之連接於國防軍的臍帶終於剪斷了。所以從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九日起，國社黨纔真正的產生出來。

二 國社黨屈膝於王子之前

可是，在暴怒的前夜，這個新生小孩的心靈會遇着比警察的槍火更要重大的危險。希特勒會要求魯博烈黑特王子與以保護。

他便借重得有王子寵愛的退職中尉紐色脫 (Neunzert) ——羅姆的朋友 ——從中溝通。紐色脫所負的任務為請求王子疏通嘉爾藉使國防軍與鬪爭大同盟的衝突不至發生。此外，在嘉爾那方面，須取消在法庭起訴希特勒及其友人。

紐色脫清早搭快車趕到柏克特斯園。王子提出這個條件：希特勒須向嘉爾道歉。他可以向嘉爾解釋說他的舉動是受了羣衆的勒迫——這實是不與事實相離很遠。此外，他須聽從合法的機關處分。王子完全不喜歡聽到嘉爾所宣稱祇以王朝之代理人的地位接受新政權；但是，他仍然向他的『代理人』表示說，他不願意軍隊藉故開槍，并且要他盡力量停止追究叛黨。

直到這個時候，王子必然曾公開認定他有繼承王位的權利，但并不會有過分的表示。他曾公開支撐政府特派員。他是否企圖從後者手中取得王冠，這一點是難於肯定的。無論如何，他認為在政治策略上，應當趁這個機會，以各方面之公正人的資格出來說話。在十一月十一日，他起草了一篇宣言，在那裏面，他責備嘉爾，并邀請兩方面的敵人在墓前握手和好。可是這篇宣言不會公佈，因為嘉爾威脅說，果然公佈的話，他便引退……。

三 希特勒想自殺

暴動後幾個星期間，調解工作還曾嘗試進行了好多次。魯登道夫希望大家免除他到法庭出席。但是巴伐尼亞人民黨卻強要法庭起訴，自嘉爾的狄克推多權力衰落後，巴伐尼亞人民黨的勢力是大見擴展，在牠採取強項態度之下，調人的努力終告失敗了。最初，希特勒也想避免到法庭。在暴動後頭幾天中，他想自殺。隨後，他被拘禁於蘭德斯堡監獄，他想絕食，但是特萊斯勒打斷他這個念頭。

起初，地方是激動了公憤而起來反對嘉爾。支持嘉爾的那些人物裏面，愛勃將軍也是其一。「慕尼黑之解放者」盡力勸告學生。在法庭裏，他曾對於這種舉動做了一篇奇異的敘述：

『幾位高年的先生跑來找我，』用游移不定的并且顯然很爲難的聲腔，他講，『而且求我對學生們說幾句勸告的話。我是不很喜歡參預口角的事情，因爲在這種環境之下，我同時要受了兩方面的攻擊。』他表示了這個態度後，仍然同意接見學生的代表，向他們解釋之中，他曾說到了希

特勒違背他的信約。

出席法庭的祇有一部份的有責任者。

魯登道夫與喬柏博士已經在腓德赫恩廈前面落於警察手中。將軍是受到極優良的待遇，並且在他答應不做任何政治活動後，對方便暫時恢復他的自由。曾鼓起十一月九日事件的激昂情緒，現在在他心中竟變成一種虛無主義，一種對於凡是代表了政府的權威之漠視的態度。他忍氣赴預審法官的辦公室，心中實感覺痛苦。到那地方後，他拒絕從大門走出法院。後來還是從暗門走出去。

羅姆、佛力克、包勒以及退職中尉布魯克勒——慕尼黑挺進隊首領——是以現行犯被起訴。在法庭裏，列席候審的還有着退職中尉華格桌 (Wagner)——他受到義勇隊首領羅斯巴克的幫助，曾帶領國防軍步兵學校學生參加暴動——與一個無罪的傀儡，魯登道夫的女婿帕勒 (Parrot)。在訴訟開始不久之前，克利伯爾自動投案。反之，受重傷的戈林及埃塞與羅斯巴克是逃往外國。戈林在茵斯布魯克 (Innsbruck) 住些時候後，隨後同埃塞逃往意大利。他在那邊大約住

了一年，同那些法西斯蒂團體發生了友誼的關係，後來到瑞典去——他從前已經認識這個國家

——同他妻子在那邊度艱苦的光陰。在希特勒的暴動裏面，他犧牲了所有數目很可觀的財產。

羅姆所在他身上早已感覺到的病象，且於暴動期中曾充分表現於對抵抗人們所說激烈的話裏，現在在瑞典，又發作到了極嚴重的程度，因此被人拘禁於療養院裏。他便沉溺於麻醉藥品了。

愛加爾也是被拘禁的人中之一，他是嚴重患病。在耶穌誕前不久，他恢復了自由，而以十二月二十三日死於柏克特斯園暴動的第二個煽動者也死掉了。

在鬪爭大同盟與國社黨各機關裏，警察終不能夠找到與暴動有關的文件。這些文件是放於司令部保險箱之安全地點，羅姆經手把牠藏在裏面，與國防軍的文件混在一起。在那個地方，任何人都想不到往那裏找去。

四 魯登道夫反對王朝與教堂

希特勒的案件乃是德國從未見過之重大的政治的案件，但並不顯出有什麼非常的地方。唯

一的非常變化的情節乃在於魯登道夫所做驚人的反天主教教堂的宣言，與同有資產的和智識的階級決裂。

『在大戰時候，』他說：『梵蒂岡並不會嚴守中立，但卻是反對德意志。法蘭西是受到庇護與尊崇。這實使我感覺苦痛——我個人原是尊視天主教教堂的義舉及其教義的——當我在前夏看到教皇起來反對我們在萊因與在魯爾所採取破壞的鬪爭；看到福煦大將在旅行美國時候，在那邊受到教會所贈的光榮寶刀；看到克利孟梭也在那邊受到名譽博士的贈與；好像所有這些德意志的敵人是爲基督公司的利益而努力的。我還記得查理皇帝所受的影響，與他之叛負德意志的行爲，以及那些天主教教士所作宣傳反德意志的演講。』

他之反教皇全權論同時使他對巴伐尼亞天主教徒的聯邦主義懷着不信任的態度。在他看去，這種聯邦主義所包含的意義是『德意志做法蘭西的奴隸，而這種奴隸的地位是將因普魯士的覆亡而實現出來。』而且，因爲使他的話不爲人所悞會起見，他還說道：『我不是主張大普魯士的；我是一個德國人，我希望有一個強盛的德意志，一個照俾斯麥的意思的德意志。』

或許在一九一八年，魯登道夫比較是擁護大普魯士的人，而到了一九二三年，他卻不願意承認了。但是在與國家主義的民族運動接觸之下，他曾排除了若干偏見。他說：

「我確信有給與人民一種新的東西之必要，使他們的生活得到一種意識。同民族解放的運動發生接觸，對於我是成爲心靈之深濃的需要了。我是主張君主政制的，但我以爲君主政制這個問題在眼前是無法解決的。王朝牠的本身並不是一個目的，牠祇是爲人民的利益而存在。」

後面一句話證明出在勞連堡做了辭氣傲慢的演講的人，心中發生了重大的變化。「最苦痛的，是那些事變使我確信我們各種指導階級是無能力向德意志人民灌輸爭取自由的志願。」

德國皇帝的忠臣，現在卻拋棄了頭戴皇冠的人，而想到民間去。這樣，到了六十歲的年紀，他找到了在他之前斯登將軍 (General von Stein) 與俾斯麥——在他晚年——所曾走過的路線。不久後，他與巴伐尼亞軍官團體斷絕一切關係，與登堡決裂，而且在一九二七年底，脫離基督教。這實是一種非常的性格，雖然有某某點是缺乏的；閉上眼睛，他暗中摸索到民間去的路徑而前進。在這一條路上，他遇着希特勒，希特勒是來自民間的，但卻是張開眼睛的，向上面坐着帝王與大

臣的高峯走去。

五 一個「擊鼓者」是什麼樣人

希特勒做了應付官司的準備，心中是打算趁這個機會更進一步提高了他由暴動所得到的名望。全球報館之最出色的訪員將到法庭來呢。對這一批旁聽者，他的自信心把他提高到上面坐着君王與大臣的高峯之上。他說：

「你們記清楚，我是不以部長的位置為可滿足野心的。一個人若祇希望以部長的頭銜流傳後世，我便不承認他為偉大的人物。我一向所抱的目的，是比這個偉大幾千倍的：我要做馬克思主義的破壞者。這個工作，我總要做到；而到我做到了後，部長的頭銜將使我覺得可笑的。當我第一次來到里察爾華格臬 (Richard Wagner) 墓前，我心是活躍着高傲的情緒。長眠此地的人曾拒絕在他的墓碑上刻了下面的字樣：「王室顧問御前音樂主任伯爵里察爾華格臬之墓。」我覺得這個人，同德意志歷史上許多其他的人物一樣，竟然祇願意將他的姓名，而不將他的頭銜，傳流後世，

使我也可揚眉吐氣。這不是因為謙遜緣故，我願意做「擊鼓者」。這個職務實是最偉大的，其餘的算是什麼東西。」

這篇話並不是完全正確的。希特勒在最初時期確是謙遜的。這種說大話也並不是缺乏了壞的嗜好。但是偉大的志趣卻會忽視好的嗜好。希特勒這篇話裏面，是含包了偉大的志趣，這是無可否認的。他有這種勇氣公然的以偉大的任務自許，卻不會顧到引起他人的嗤笑。

六 魯登道夫的『心不在焉』

全體被告幾乎都承認他們所被控告的各種事實，有些還帶着傲慢的滿意態度。克利伯爾爲解釋他之參加暴動起見，曾說了一番可供後人參考的理由。鬪爭大同盟的首領，原是具有天生的軍人的天真，他是這樣說：『我之認識威馬爾憲法，並不多過於巴伐尼亞憲法。當人們起草威馬爾憲法時候，我是服務於停戰委員會。因此不會看到憲法的全文。但是所有巴伐尼亞報紙，所有愛國的議員，所有各部長，都喊道：打倒威馬爾憲法！我那時，在我的軍人簡單頭腦裏，因此想道：既然大家

都反對這個憲法，爲什麼不把牠推翻呢？」

魯登道夫的態度是不同他們一樣。其他的被告都承認犯了叛逆的罪狀，祇要求嘉爾應當以同樣的罪狀也到法庭受判；魯登道夫卻與他們相反，他極力認爲自己是嚴格的依據法律與憲法而行動的。

判決主文裏面也承認魯登道夫應當享受與其他各被告不同樣的待遇。法庭沒有勇氣處罰全德國最有名望的人物。但牠是難於否認當希特勒廢立愛伯總統與德國中央政府時候，他是不會站在布格博羅酒店的講臺上。法官們於是想出一種簡單的遁辭——不過終不能遮掩任何人的耳目，這裏面是說：十一月八日晚上，魯登道夫心中應是非常感動，因此他不曾看見也不會聽到在他前後左右所經過的事情。這樣地宣告無罪是不很光榮的，而將軍也以動人的聲音喊說這是侮辱了他的身份。不過，他總是受了宣告無罪的處分。

七 寬仁的判決

慕尼黑人民的心中總無須乎因爲這番判決而感覺痛苦了。陪審員們是熱烈的爲各被告辯護，並且要求宣告無罪。爲要得到判罪之法定的票數起見，法院主席祇得向陪審員們保證所處的刑罰將不至於執行，或將不全部執行。

因此，希特勒、衛柏、克利伯爾、包勒等人於一九二四年四月一日，以反叛國家的罪名，被判處五年拘禁，但是法庭方面通知各被告說受刑滿六個月後，他們便可得緩刑的待遇。除了魯登道夫之外，其餘的被告被判處三個月拘禁，但都受到緩刑的待遇。說句實話，這次判決實成爲法官對於暴動的褒獎。而關於希特勒方面，比四年半的緩刑更見重要的，乃是法院並不會與以驅逐出境的處分，而在保護共和政府的法規裏卻對此有着嚴格的規定。加之，法庭也不會將希特勒於一九二一年頭一次受判的兩個月拘禁併科執行。

法庭的寬仁是無涯際的。頭一件，在五月一日作暴動的企圖後，法庭對於希特勒的起訴是取消了。

現在牠卻是更進一步了。總檢察官曾反對緩刑的處分，結果是無效的；他曾使大家注意到這

種寬仁的態度是等於鼓勵反叛國家的行爲，結果也是無效的。假定巴伐尼亞最高法院不會顧全陪審員的意見，牠或許可以採納總檢察官的訴狀，而希特勒或將等到一九二八年纔能夠離開監牢。然而巴伐尼亞司法部長孤爾脫勒有心使希特勒恢復他的政治活動權。由他的內弟杜爾（Durr）參事居中接頭，孤爾脫勒請總檢察官撤回訴狀，緩刑的處分終於仍舊維持着。

八 魯登道夫領導國社黨

希特勒一到了剋制起初的失意後，雖然關在監牢裏，他決計保持國社黨的領導權，因為巴伐尼亞法官並不會以阻礙那些犯法者繼續做他們反叛國家的活動爲他自己的職務。希特勒在訴訟進行當中的情形和在判決後的一樣，有權利接見外面來的代表，集會討論，並且發表宣言，簡直是無異在自己辦事室裏面。僅是出外旅行，他是受了禁止。因此，關於在外面接洽的事件，他將全權付與他的政治顧問羅森培。羅森培使同國社黨第二總理查可伯組織了『大德意志民衆大聯合』（Grossdeutsche Volksgemeinschaft），後者是用以替代被取締的國社黨。

希特勒希望他的政黨以新的名稱忠守舊的綱領。反之，魯登道夫卻堅持國社黨與格拉夫和伏爾的人民黨（德意志人民自由黨 *Deutschevölkische Freiheitspartei*）合併。希特勒嚴酷的回答說，假使國社黨領袖與政綱，可以保持優越的地位，他便可贊成合併。關於這一點，即使希特勒是處於行動自由的環境，格拉夫尚不肯作這種讓步，何況現在希特勒身處囹圄，格拉夫更要表示拒絕了。

現在連希特勒的話，都不爲人所聽從。他是反對國社黨參加選舉的，但其他領袖都表示贊成，他們便露骨做去；希特勒的親信朋友，卻沒有一個名列候選單裏面。在候選單裏，有許多人民黨的老輩，他們都準備投入一切可以進去的社會，下級官吏，圖書館副館長，初級法庭法官，學校會計與教員等等；大家都想博得一個位置，作爲他們所認爲有功於民族運動的報酬，而結果大家都如願以償。在這些有名的份子裏面——他們會與一九二四年一月七日在班堡（Bamberg）成立『巴伐尼亞民族主義派大聯合』並曾想頌揚希特勒的光榮以求得到國會若干議席——幾乎沒有一個國社黨份子。這些人是屬於自由的智識階級老份子，眼前在國社黨裏面仍然是中堅份子。

——不過從前以資產階級的傲慢態度對待士匠希特勒，從這個時候起，這個態度是稍為消滅了。關於有工人身份的代表，他們便選出被希特勒取消黨總理地位的特萊斯勒。到最後期間，希特勒費極大力量也將斯特萊徹列入國會候選單裏。

選舉結果是極可觀的。民族主義派大聯合得到巴伐尼亞邦議會(Landtag)二十四個議席；并且四個星期後，到五月四日，得到國會(Reichstag)三十一個議席。

這麼多量的議席之獲得，實使幽禁於蘭德斯堡的希特勒頭上潑了一盆冷水。事實絕對的證明他的反議會的策略是不對的，為的是選舉勝利實成爲最動人的宣傳。希特勒很感覺到痛苦，生了厭世的觀念與鬱結的病狀。探視他的人，都感覺他是猶疑不定。這原是他的本來面目，但直到那個時候，不像在監牢那樣，他比較能夠與以掩飾。

因爲他的代表人羅森培沒有權威，同時後者傲慢的狀態使人躲避他，希特勒的勢力因此受到重大損害；他由是改派包勒。從魯登道夫宣告無罪後，包勒痛恨魯登道夫。不幸的很，包勒又沒有領袖的魄力。他的同伴責備他不能活動，因爲這個問題，巴伐尼亞民族主義派大聯合首領便寫了

憤慨的信給魯登道夫和格拉夫。

三十二名議員進衆議院後，格拉夫堅持在全德國境內統一民族主義的運動。他籠絡了羅森培，並於取得希特勒的同意之前，宣佈統一的辦法。到第二天，羅森培使同費德赴蘭德斯堡；他們兩個向希特勒提出統一運動的計劃，計劃裏面，將領導機關分爲兩個，一個管轄德意志北部，另一個管轄德意志南部；但是他們不提起另一個事實，即是照魯登道夫的主張，國會裏面的份子，是已經決定合併起來。希特勒照他向來不信任的態度，不加以任何應許。但是，到第二天，他在報上看到登載說，根據他本人的志願，全德國所有民族派各黨合成一個唯一的組織，他閱悉之下，勃然忿恚，痛罵這些人趁他幽禁時候蒙騙他，並且視他等於廢物而把他擠去了。他便寫信給民族派各機關報，聲明他放棄國社主義運動的領導權，而且在他幽禁時期中，他摒絕一切政治的活動，他收回他所授與各代表人的全權，並請後者不必向他有所請求。此外，他的舊黨徒從此後可以不必再來探視他。

這種舉動是等於向魯登道夫正式宣戰。魯登道夫現在是忍無可忍了；他的政治地位是受了

牽連。

直到那個時候，在民族主義運動裏面，魯登道夫僅是靠他自己出面以鼓動大家興奮的大人物。曾經統治半個歐洲的他，不會覺有在愛國團體的組織裏面親自動手之必要；他將實際任務交與小將領們、中級軍官們以及各中學教員。他也曾放任希特勒下手做去，固然他可以對希特勒發號施令。但是現在呢，他再也不能維持這種寬大的態度了。

現在他依照自己的心願，自處於新「獨立國家社會主義黨」的領袖地位，在那裏面，他同格拉夫擔負全德國的指導權。他將蘭德收特藥劑師斯特拉塞——以國社黨代表的身份——召來身邊。

九 斯特拉塞之出臺

在長時期中，斯特拉塞或許是國社黨之最使人注目的人物。他的外貌是龐大異常，有獅的大聲腔與熊的大氣力；同他比較起來，希特勒是渺乎其小了。斯特拉塞之開始認識希特勒為演講家，

乃在一九二一年但起初他與後者祇有着少許共同的見解而且這種共同的地方或許祇限於國社主義這個單獨的名詞。他以辦事精力與野心壓服黨的其他各領袖；不過他有點缺乏靈敏的觸覺。他不爲猶疑不決所惱亂，因爲這一點，他是長於實際工作而不長於創造。以政治的人物而論，他是大戰後的人物之最可注意的代表者中之一，國社主義運動便是靠着這種大戰後的人物而發展的；以尋常的公民身份，他以爲無永遠以舊的著名人物選派到議會去的理由。他爲不知名的德國人，從戰壕回來，現在自己想掌握國家的命運。

在最後期中，斯特拉塞在國社黨裏會充當下巴伐尼亞區首領與下巴伐尼亞挺進隊總指揮。他不屬於希特勒之親信份子裏面，在黨中毫無勢力，當暴動那天，他曾擔任危險的任務，防守伊薩爾河邊。大家也把他忘記了。到一九二四年，他被選爲邦議會與國會的議員，這是他被人擁出臺面之第一次。

希特勒始終有着兩個忠實的黨羽擁護他的主張，並且步步還擊魯登道夫。這兩個便是埃塞和斯特萊徹。埃塞是從他的流亡所在地急遽回國，在民族派各次集會之中，他大聲疾呼反對那些

『先生們與博士們。』他喊道：在國會裏面，從前大學出身的人是太多了；凡是不願意無條件順從希特勒者儘可請退回原處——他說話時候，揮動手杖，採取一種威脅的態度。特萊斯勒請他安靜些，而結果不生效力；埃塞并不因此而檢點他，並且堅請民族派議員祇可在議院裏拍桌面吹哨子。可是，在同時，邦議院的民族派議員卻曾宣稱他們想做建設的工作呢！

埃塞曾從斯特萊撒身上，後來又從著作家亞都爾丁脫（Arthur Dinter）身上，找到同盟者，他於本年七月初被舉為『大德意志民衆大聯合』的領袖，即是羅森培所組織的政黨，後者竟這樣地被敵人所排擠了。雖然始終忠實於希特勒，羅森培卻繼續憎惡埃塞，往往於稠人廣衆之中，將埃塞描寫到那麼暗晦的形狀，竟然使大家覺到希特勒是因同埃塞勾結而受了陰惡的牽連。埃塞便回答說：『人們可以將破壞名譽的罪名加到我們身上。我們不爲這個而動情，即使對方能够做到欺騙我們。進攻失敗後便棄刃而逃，這纔是一個極其拙劣的將官呢。』可是，羅森培也好，斯特拉塞也好，都否認採用這種『軍事學。』

十 羅姆組織新的隊伍

在這時期中，魯登道夫完成了他的工作，八月十六日與十七日曾於威馬爾開了獨立國家社會主義黨各首領的大會。希特勒打電報給斯特拉塞，堅請他與民族派決裂，但結果是無效的；羅森培、埃塞與斯特萊撒都擁護希特勒，但結果也是無效的；斯特拉塞仍然站在魯登道夫那邊。或許他也恨怒國社主義者以無禮的態度攻擊魯登道夫將軍。因為他們的無禮態度，魯登道夫便會發怒，離開會場，表示反抗之意。

敵人方面是易於應付魯登道夫，這是的確的。凡是他所經營的，無有不失敗。在這失敗的事業之中，便有組織新武力的失敗——他想藉羅姆的幫助，為黨組織新的武力，後者的名稱是叫做前鋒隊（Frontmann）。

羅姆得到希特勒與戈林所授與領導挺進隊的全權。但當他攜魯登道夫的計劃前往蘭德斯堡時候，希特勒一方面疑懼因此而完全失掉黨的領導權，並且使總檢察官有所藉口而延長他的

幽禁時期；另一方面，他又不願意隔斷了黨之新組織的消息。因此，他不說是，也不說不是。羅姆原是腦中有了軍事計劃後便不考慮政治上問題的人，他立刻下手做去；他於是同軍人的與愛國的各舊團體組織一種可與鋼盔團(Stahlhelm)相頡頏的隊伍。

不幸的很，他祇認識了軍事條例，而不懂刑法的規定。他起草了入隊志願書，隊員應該在那裏面發誓追隨魯登道夫及其所任命的官長直到『死而後已』。可是，這種無條件的服從誓約是爲德國法律所嚴禁的。

總檢察官現在可以作進一步的舉動了。希特勒及其同伴原是希望於十月一日恢復自由的，但現在卻受了同謀的嫌疑，仍舊須幽禁於監牢裏。因此在希特勒、羅姆及魯登道夫之中，發生激烈的攻訐。到了格拉夫與斯特拉塞也想參預前鋒隊的領導機關時候，彼此間的爭執更加嚴重。羅姆極力反對他們的企圖並且反進一步堅求在國會議員幫——他本身已經在內——裏面增加他的勢力。一九二四年的國會壽命是很短促的。當準備新選舉時候，羅姆要求在候選單裏面將他與戈林的名字列入首排。這個事情便發生決裂了。戈林住在意大利，他的名字就乾脆不會列入，而羅

姆的名字被放在末尾，因此不會當選。因爲這回事情，羅姆永遠不肯原諒斯特拉塞。

至於前鋒隊事件所產生的結果，便是希特勒仍然留在監牢裏，差不多延長了三個月之久。

十一 困難時期

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七日德國國會選舉的結果，是民族派方面失掉將近半數的原有選民。一方面，馬克價值的穩定使人心趨於安靜；另一方面，民族派內部各領袖的對敵行爲使他們自己的部隊感覺厭倦。因此，民族派的議員祇有十四名重進國會。

希特勒現在可以感謝運命的賜與了，在他幽囚期中，國社主義運動竟然受到這種打擊。他咀嚼報復的甜味，洗雪他所受到的侮辱，因爲黨會不理他的主張，而參加四月與五月的選舉。他對於過訪者改換他的口吻——他雖禁止人們來獄探視，但他們仍然陸續的來。在九月中，他還宣稱可以同意於參加選舉，現在他又去破壞腐敗的議會制度了。而在國社主義者中，便有人埋怨說若早希特勒在場就不至有那種禍事發生。

其實，希特勒也不能為黨挽回失敗；失敗的各方面原因是過於深重了。貨幣價值已經穩定；道威斯（Dawes）計劃曾得到德意志國民黨的同意而被接受；同法國妥協的政策是順利地進行着；德國的經濟狀況是趨於繁榮了。利率從可驚的高度逐漸降低，而到貨幣穩定後，牠立刻維持不動；實際上，牠還是非常之高；而因此使外國的資金擁入德國。這些資金使用於德國工業之復興與其合理化等等事業上，結果使大家差不多都能找到工作。

一九二三年之國社主義的煽動既然是基於經濟困難的原因——其中大半實因為這個原因——那麼，現在情形變更，牠自然是和緩下來。沒有人希望那些受濫發紙幣的影響而犧牲了的不滿意份子再來鼓動新的風潮使國社主義得以從中漁利。而且政治的策略，是不能夠採用過去的口號，以發展眼前的行動。濫發紙幣的時期已相去很遠了；國民祇求忘卻慘痛的時期，現在卻腳踏劫後骸骨而努力向前進取了。

在這種新的情形之下，國社主義再無活動的餘地了。希特勒和魯登道夫：這些名字所代表的意義是：機關槍、暴動、與狄克推多。他們曾於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九日得到他們再好不過的機會。而

他們卻隨手將牠失掉。這是太可惜了。到了今天，大家是經過合法的方法而達到可以苟安的環境，而且在少數的民族派團體之外，各個選民都堅確認定希特勒的名字是不再出現於政治的廣告上面了。

越是民衆方面擴展他們之無所可否的態度，黨內部的對立是越見尖銳了。「先生們」現在明白了應當替希特勒想點好辦法，這不但應當在暗中進行，而且應當光明坦白的向全國下手。斯拉塞便負責做去。剛好巴伐尼亞邦議院正在討論恢復希特勒自由的議案；斯拉塞便從他的座位站起來，向首相黑爾德大聲說道：「這個拘禁處分是帶有階級性之最卑鄙的裁判所做的舉動，這是巴伐尼亞之可恥的污點，巴伐尼亞是處在一羣狗才與壞蛋的統治之下……」首相便離開會廳。斯拉塞立刻被驅逐出，他再不在那裏出現了。從此之後，他把全副活動力量都用於德國國會。

十二 從魯登道夫到黑爾德

希特勒現在到底從蘭德斯堡監獄放出來了。他一身所剩有的，祇有他的自由。他在全國，有幾千朋友，且有很多羨慕者；但同民衆的關係是斷絕了。在一年的過程之間，民族派的運動竟成爲自己的信徒所目爲可恥的對象，而且被民衆傳爲笑柄。

希特勒以十二月十七日釋放出獄。巴伐尼亞政府視他同一個尋常「十一月事件的罪人」一樣，對他所取的態度并不比後者特別優良，也并不特別惡劣。與他同時釋放的，還有幾個同伴，不過他們前此在獄中的待遇，并不像希特勒那麼舒服。

埃塞和斯特萊徹便聚於希特勒的慕尼黑家中迎接希特勒。希特勒請求他們絕不要解散「大德意志人民大聯合」。這個團體或許還有用處呢。

隨後，他首先決計同魯登道夫決裂。在最後幾個月中，魯登道夫曾做了種種舉動使他自己再不能夠同巴伐尼亞天主教接近。他曾寫一封熱烈的信給「新教大同盟」的大會，表示他的敬意，并且推動基督教徒反抗羅馬。他很無謂的同魯博烈黑特王子發生惡感，責備後者——其實完全是錯誤的——應負十一月九日暴動失敗的責任。在爭論當中，巴伐尼亞舊軍隊之二十七個將領

都擁護王子而與舊統帥決裂了。

所有這些重大的錯誤，都使希特勒證實了他的意見，即是魯登道夫是毫無政治的意識。加之，魯登道夫企圖引誘那些精神上肉體上完全服從希特勒的信徒歸附他自己，因此他使希特勒在私人上感覺不快。因為受到共同的侮辱，所以在希特勒和在包勒心中生出共同的怨恨。在一次同魯登道夫作難堪的談判中，希特勒宣佈取消他們的政治聯盟。但是他不會對魯登道夫說明，爲他自己的利益，他可以漸漸同羅馬勢力接近，而不管後者卻是和羅馬愈離愈遠。

在他恢復自由後幾天，他謁見黑爾德首相巴伐尼亞人民黨舊領袖（黑爾德）現在是受到民族主義者的激烈攻擊。所以希特勒之前往拜訪，是很動人的。因為他想減輕這種印像起見，他使託辭說他的目的祇爲着替幽禁於蘭德斯堡獄中的同伴辯護，并且也替包勒辯護（後者還不會投案受刑）。其實，他的拜訪目的是爲向首相提出民族主義的批評者所叫做的『與羅馬講和』。希特勒開頭便向黑爾德保證他的忠實態度與不越法外的心緒；他承認十一月九日的暴動是一種錯謬。他表示願意在政治上與政府合作；還曾說了『鞏固政府』這個字眼。首相便問他怎

能夠將同政府合作與『反對羅馬』兩件事情調和起來，而反對羅馬恰是民族主義派政策的主要目的呢。反對羅馬乃是魯登道夫的意思，希特勒很激昂的回答道；至於他本人，一向絕不會攻擊羅馬，將來也絕不至攻擊羅馬。從訴訟後，他便同魯登道夫失感了。他不攻擊任何資產階級的政黨，而且將來也不攻擊；他專為反對馬克思主義而奮鬥的。假定首相自己也要領導這個鬭爭的話，希特勒是願意供其驅使的。

他這些話確是誠實的，幾天後他便證明出來：手中拿一條馬鞭，他出現於邦議院民族主義派議員的會中，責備他們不參加巴伐尼亞政府。要不是同一個政府共同合作，便應當同這個政府作熱烈的鬭爭；總沒有站在中間的道理。

這樣，從蘭德斯堡監獄所發出來的消息，現在被證實了：希特勒不贊成反對巴伐尼亞人民黨。即使是反對德意志國民黨，他也不贊成；他願意在資產階級陣營裏彼此和平相處。

黑爾德首相僅是一半相信希特勒的意見。事實上，他撤消了取締國社黨的禁令，但他冷酷地對國社黨領袖說明他維護政府的權威而制裁企圖與以侵犯的任何人；他絕不寬容再有如一九

二三年十一月九日的事變繼續發生。至於包勒，他終不能得到特赦，仍須以一九二五年一月五日進牢獄去。

民族派方面批評者們之責備希特勒接近巴伐尼亞政府，實顯出他們不會認識希特勒的主要的政治理想。後者雖然在各次革命黨的會場中大放厥辭，其實他歷來需求得到當局的庇護。直到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實際上當局是國防軍。到了魯爾鬪爭結束，德意志國民黨人參加中央政府內閣，道威斯計劃簽字等等後，軍人的權力是退到後臺，而將政府的領導權讓給文人當局。另一方面，維持那些軍人各團體會員之無數的祕密存在的士兵的源泉，現在因社會穩定而涸竭了。在政治上，現在是到了資產階級的世紀降臨時代。

希特勒由是決心，在取得他所能獲到寬仁態度的右傾政府的庇護之下，從新創造巴伐尼亞民衆運動。他想先由加入這個政府的步驟而達到使巴伐尼亞變成國社黨權力的堡壘之結果。舊的計劃仍然是有效的——照那裏面所說，在五年之內，不要產生將運動擴展到德國北部的念頭。希特勒願意仍舊反對議會，但是採取和平的態度。永須保有當局的優遇；這乃是他之「合法的」

德國國社黨史

政策所傾向的理想。

第七章 一九二五年

一 新國社黨

格拉夫現在是忙於組織他之新的民族主義黨。在一九二五年一月底，獨立國社黨在柏林開『普魯士大會』。希特勒從他與魯登道夫決裂之後，再不能希望得到北方的德國人的諒解。格拉夫和伏爾責備他再不想做『擊鼓人』，而想做教皇。同時，魯登道夫宣稱說，如果希特勒要拿回國社黨的總領導權，他本人即要擺脫不顧，而且他將要放棄一切政治的任務。但事實上，魯登道夫——格拉夫——斯特拉塞三頭政治終於二月十三日引退，而格拉夫便於二月十七日同伏爾烈芬特羅與斐立赤 (Fritsch) 組織一個新的政黨：德意志人民自由運動黨 (Deutschvölkische Freiheitsbewegung)。

可是，在這時期中間，巴伐尼亞政府撤消了取締國社黨的禁令。希特勒便趁這個機會，立刻決定歷來爲黨內信徒與敵人所望而卻步的主意：改組舊國社黨新國社黨，仍然保持原有的首領與原有的綱領，但牠的黨章是經過修改了。

二月二十七日，在布格博羅酒店，對數千聽衆，希特勒做他恢復自由後頭一次的演講。他誇稱手下還有四千黨員，并且用隱約的言辭攻擊魯登道夫說：我們不應該一下子追趕二十個野兔。他自己祇認得兩個敵人：以人的方面說，猶太人；以思想的方面說，馬克思主義。可是，當他指明一個敵人，他可以暗中指出第二個敵人。

他所曾經長時期酌定的演說，是活躍着激烈的反映：「凡你們到處看爲是好的，是屬於亞利安民族；凡你們看爲是壞的，是屬於猶太民族。我們可以撕破和平條約，可以取消賠償，然而猶太的毒質總是作破壞德意志的威脅。我們祇須看到腓力特力街 (Friedrichstraße) 上，每個猶太人臂上總挽着年輕的德意志女人。我並不要求羣衆特別的優遇。在此後一年內，你們可以評斷我。假定我做得好，大家再繼續做去；假定我做得壞，我便將我的任務奉還你們手裏。但是，從今起，是由我

來指導黨務，而在我負責期中，任何人不得向我提出條件。凡一切關係着黨的存亡問題都由我從新擔負完全的責任。我們的鬭爭祇有兩個可能的結局：或是敵人踐踏我們的屍首，或是我們踐踏他們的屍首。假定我在下次鬭爭中死掉，我的希望是卍字旗做我的收殮布。」

希特勒在監獄裏發胖了。他之外面噴湧着熱血的怒氣的演講，實發生了可驚的效力。驟然間，舊日的仇人都跳上講臺：一邊是埃塞、斯特萊撒、與丁脫，另一邊是佛力克、布特曼（Buttmann）與費德——他們彼此握手。這一幕是演得非常精彩，其莊嚴的情緒是不下於演講的。各領袖之間，現在應當停止一切爭論，希特勒歡呼道：「當他正在說話時候，布特曼宣稱他所有疑雲現在都消散了。」斯特萊撒在情感衝動之下，格格不吐的說道：「大家應當感謝上帝護庇希特勒，人們使希特勒受了犧牲，便等於使老百姓受了犧牲啊。」

不過是，和好工作不見得全部成功；裏面有缺席不來的：譬如特萊斯勒這個人，在前一天，希特勒曾打電話給他，請他做開會的主席。但舊名譽總理卻提出幾個條件，裏面使有不許埃塞進場的要求。希特勒發怒了，便掛上電話，再不睬他了。斯特拉塞也不會到會，他還不能決定是否要屈服於

希特勒，他對於後者私人上并無感情，而在見解上又極少共同的地方。

二 國社主義的道德觀

在好些年之間，希特勒之最重要的工作乃爲替他的政黨創造一個首領的幹部，因爲國社主義運動的存亡，是靠在這個問題能否解決。當希特勒改組他的政黨時候，他曾對於選擇首領的問題，申明幾個原則，那裏面的態度從容的臨機應變主義，卻與他歷來批評敵人所採取的嚴厲態度，有着極其激烈的反映。這些『方針』是這麼重要的，所以我們在這裏有抄錄原文之必要，下面是錄自人民觀察報一九二五年二月二十日所登載的原文。

『我認爲一個政治的領袖在他所擁有的人才上，沒有想法改良，或即是想法建立，一種單位的力量。每個人的情緒、性格、與能力是這麼複雜的，所以聚集一大羣人使大家都有完全相同的構造，是絕不可能的。以教育的方法來救濟妨礙這種單位的實現，這也不是政治領袖的任務。凡是這一類的嘗試必不免於失敗。人類是既定的和現實的表現，絲毫不能隨意變改，而且他之極其緩慢

的進化是經過好幾世紀纔有所成就的。一般的說，這種緩慢的進化，本身之實現，須有民族根本的因素發生變化。

「一個政治領袖若想深入這條路上，他將要作無窮期的打算——而不是作幾年或至多幾十年的打算——始有達到他的目的之可能。

「因此，他的任務祇是在這些極不類似的人中，找出可以使他們合成爲一個單位的共同之點。

「這樣，他不能夠打算在合於理想的與普通的標準人物身上，爲他的政黨羅致一批人物，但須在現實的與各有極不類似的才能的人物身上着想，後者是由他們的全部而組成了一種和諧的結構。

「一個政治領袖若不承認這個實情，並且祇想羅致合於他的理想的人物，結果他不但要看他的一切計劃失敗，並且不能樹立一個組織，而反立刻陷於混亂的狀態。到那個時候，他便想將一切錯誤歸咎於他的信徒或他的同事，而其實，他本身卻爲對這個情形之唯一的負責者。」

下面是這篇話的結論：『我所擔負的任務，是使黨中廣羅具有最不相同的情緒、能力，甚至於性格的各種人物；他們可以在黨中彼此互相彌補，而且能夠為全部的利益而共同努力。』

希特勒在這裏所提出關於選擇首領的原則，乃是目的可以證明手段之正當。這篇曼畢的宣言所由來的理由，是因為當他羈留在監牢時候，那些爭權的首領受到對他們個人的攻擊，并且埃塞與斯特萊撒也受到外間同樣的攻擊。直到這個時候，經驗曾證實了希特勒的理由；羣衆并不怒視國社黨各領袖的性格。國社黨的確包含了多量之廉潔的與清正的官吏，但原則上牠內部並不排除『結構不同樣的』各種性格。不過是，既然有着這種原則，我們不甚明白何以希特勒還能夠稱呼他的政黨為廉潔人物的政黨。恰是相反的，國社黨乃是最富有行為曖昧的企業家，甚至超過於曖昧，即使是列於最高位置的人物，這一類的政黨中之一個而已。

這種構成國社黨的幹部之『構造不同樣』的性格，乃是國社黨之最大不幸的一個原因，總有一天會使牠受到損害。要解釋希特勒之對於他同事的德性所採取無所可否的態度，我們或者可以說因為他有着個人上無可非議的人物之超出尋常的情緒，而且他心中祇懷達到目的的念

頭。不幸的很這不但是關於羅致各首領的問題上，希特勒對於選擇方法不曾謹密從事。國社主義運動之產生，實恰在政治暗殺罪案公然盛行的時期中。羅姆所招集的陰謀者的團體，實為巴伐尼亞這一大批恐怖之謀殺行為的鼓動者，而其中的各罪犯從來不曾破獲，因為上面那個團體替他們保護。從希特勒一生的過程裏，我們看到他之對待暗殺罪件之親昵的態度，從安置許爾斯（Schulz）和亨斯（Heines）於國社黨的首領地位之讚許暗殺拉德羅的兇手態度，直到了他寄與暗殺波當巴（Potempa）的兇手的電報所取的态度。在這地方，絕不僅是為主義的成功而犧牲了良心的問題。希特勒會常常宣稱他絕不重視人類的血熱心擁護一種理想——人們對於他所不能否認的——或許能夠諒解某某種道德上的遷就；但接受這種遷就所採取之無所顧慮的態度，實無從證明其為正當的。

加之，在他們蔑視一切道德與法律的楷式者心目中，他們的行為乃是帶着革命性的行為。關於這一點，羅姆所說下面的話，或許是最忠實的了：

「所謂社會道德，乃是比任何都要虛偽的東西。我先聲明說，我是不屬於勇士的階級，而且我

也沒有使人視我爲他們裏面一份子的野心。我更不願意附屬於「有道德的」人物的儔類，爲的是經驗告訴我說，這些「道德家」的「道德」并不算是大了不得的東西……大家所叫做政治家，羣衆領袖，這等等的人物，當他們注重道德的時候，往往是他們心中毫無更好的理想之明證……有些「民族主義的」著作家，隱藏於安全的口岸，袖手旁觀大戰的經過，在他們心中，這種情形當然不能使之驚異的……即使政府自命有權，倚賴各種法律，來節制人類的情慾，即使牠以爲這樣便可以將後者領向其它的路徑，這種辦法在我看去，總是幼稚的和不適當的……瘋狂，瘋狂，到處是瘋狂！正如李察爾華格桌的作品中漢斯沙克斯（Hans Sachs）所說的。」

這種自由的追求乃是絕望的呼聲，雖然牠自以爲表現『陽性』的見解。因爲我們總不能夠違反下面這個原則：個人的權利是不能超過侵犯隣人的權利的範圍。

三 希特勒巴伐尼亞政策之失敗

希特勒希望在巴伐尼亞政府庇護之下，可以反抗柏林政府，但不久後，他便告失望了。他之同

黑爾德談判，已經不是在使人可以安心的空氣中過去。他曾對首相保證說他祇認得一個敵人：馬克思主義；但不久後首相便似乎不相信他的話了。因為在他出獄後演說之情緒熱烈當中，他曾不覺的吐出兩句話，這兩句話便使他受到不幸的遭遇。頭一句話是講到敵人，但他並不會提起名字講明是誰。巴伐尼亞政府可以認為是隱約指牠身上。第二句話是講到希特勒要踐踏敵人的屍首；這便使警察當局有所感動了。

巴伐尼亞內務部長於是禁止希特勒公開演講。普魯士和大部份其它各邦便羣起仿效巴伐尼亞的榜樣，此外，在德國北部，國社黨并且遭受取締的處分。

希特勒的運動計劃是被推翻了。他之發動巴伐尼亞以反抗柏林的希望是消滅了。我們不能說定他自己是否立刻覺得有將運動中心移到北部的必要，但另一個人必然理會到：這個人便是斯特拉塞。

斯特拉塞還不會同希特勒重修舊好。他是爲着幾個理由：希特勒這個人物及其各種目的，在都使他認為是可疑的；不過，希特勒是還未到他的左右那種程度。以巴伐尼亞人而言，斯特拉塞

雖然比希特勒更多土著的色彩，但在這種事情上面，他立刻現出較少帶着本鄉的氣味；他是反對將運動的總機關仍舊留在慕尼黑。

可是，希特勒之二月二十七日不幸的開場，實使斯特拉塞確信德意志新民族主義黨失掉了巴伐尼亞的地盤了。國會中兩個巴伐尼亞議員，佛力克與費德，已經同希特勒和好如初，繼之者便有民族派議員狄特力克（Dieckich）。斯特拉塞還應當為攻擊希特勒之國會中唯一的巴伐尼亞議員嗎？他於是採用最後的步驟：他向巴伐尼亞區民族派各團體調查意見。他所得到的答覆，是使他相信無抵抗之用處：大部分的團體主張回到國社黨。三月十一日，在民族派大聯合之最後區大會裏面，斯特拉塞神色沮喪，宣稱說：埃塞和斯特萊徹確是聲名狼藉的同伴，我們拒絕同他們合作是很有理由的。然而，在人的問題外，現在卻有着國社主義的運動，這個運動是必要的，且有廣大前途的——這是他，斯特拉塞自己，在旅行威斯特法尼（Westfalen）與普魯士中，曾產生這樣的信念。「假定我是因為一種理想而生存，我將追隨我所認為最有利於這種理想的成功的人物，這個理想在我心中是代表一切的。即使我看到這個人物的左右是我所視為有害於我理想的成功，我

自己還是說：主義是高過一切的，此所以我本人聽從希特勒的驅使。

關於這一點，斯特拉塞是顯得比特萊斯勒聰明了，後者總堅持成見，不願與埃塞和斯特萊撒這種人物混在一起努力。

斯特拉塞之回黨，便完全移動了國社黨的重心。爲什麼緣故呢？這似乎是十分滑稽的，原因是在於他以議員的身份所享有的鐵路免費旅行證。靠著這張旅行證，一個熱烈的活動者得以做到一種有利的宣傳並且因爲這個自己得在黨中造出優良的地位。至同黨其他國會議員都不是演講家。而斯特拉塞不但攜有他的旅行證，且也帶來他自己的金錢，這批金錢是由出讓他的藥房而來的。無疑的，不是一個大數目，但在那個時候，國社黨卻須重新每文錢計算。不久後，斯特拉塞便顯出是一個最有能力的運動者，而且在活動的精力上，他是超過希特勒的。靠在他身上，趨向於議會的活動，是在黨中處於優越的地位。希特勒再不能想使黨與議會分離了。

在同一個時期，希特勒失掉了最可貴的政治顧問。包勒於受完三個月監禁後，出獄祇有幾天，以四月十一日在汽車失事中死掉。那時候，大家看慣了政治的暗殺案件，所以包勒的朋友們嚴厲

認定汽車司機爲使汽車出事起見故意將車輪脫落，並且他們還向他提出訴訟。

希特勒又失掉了另一個朋友：羅姆；他同羅姆發生爭執，因爲當戈林在國外時候，羅姆收回挺進隊的領導權，現在他拒絕將挺進隊屈處於希特勒之絕對的權威之下。挺進隊便因此瓦解，而國社黨在整一年中不復擁有牠了。這次決裂會使羅姆感受很大的苦痛，他原是易受友誼所感動的。他寫信給希特勒，要求後者至少不要斷絕他們私人的關係。但希特勒不會回答他的信。羅姆便再發他的信，這一次卻是登載報上。人民觀察報祇將他的信登載出來，而不加以批評；不論是在私人方面或是在公開方面，希特勒仍然默不做聲。事實上爲國社主義機關之真正的設計人，現在卻悄然離開，不會受到謝禮，也不會受到敬禮。羅姆在好幾年中不能不隔離政治的舞臺了。

四 斯特拉塞之成爲障礙物

一九二五年五月一日，希特勒是處在比去年十二月十七日——他釋放出獄的日子——更要慘淡的環境。包勒死去了，接近巴伐尼亞政府的計劃失敗了，挺進隊失掉了，而他部下的半部份

是財政上與精神上均操縱於斯特拉塞手中了。上面便是國社黨改組後的眼罩。

這一時期的活動是幾乎專歸斯特拉塞領導。他用颯馳電掣一般的速度，在北部成立了等於一個新的政黨。在三月底，他於哈爾堡 (Harburg) 聚集來自德國北部各地之可信任的人物，向他們保證希特勒的『羅馬』政策，並且消滅他們對於南德意志人之不信任態度。盲目服從一個領袖的原則，是還未能够使這些人信從；或者是，至少在他們心目中，所想像的領袖可不同希特勒那樣。但是，無論如何，他們祇同斯特拉塞接頭。斯特拉塞竟然成立了國社黨七個『黨區』(Gau)：什列斯威好斯敦 (Schleswig-Holstein)、漢堡 (Hamburg)、梅格稜堡 (Mecklenburg)、逢麥綸 (Pommern)、哥廷根 (Goettingen)、呂涅堡 (Lüneburg)、與哈諾瓦 (Hannover)。不過在那個時候，他並不抱嚴格的態度，而且祇要有着多少可信任的人物的地方，他便成立一個黨區。斯特拉塞也在柏林成立一個黨區，但沒有得到好成績，因為後者終於在本年底自己解散了。在這個時期中，國社黨的宣傳是不能進入柏林的。

當斯特拉塞在北部開闢一個王國時候，希特勒須在南部保持他的原有地位。在巴伐尼亞邦

議會之二十四個議員中，祇有六個對他還是忠實的。在屠麟根 (Thüringen) 在瓦敦堡 (Württemberg) 尤其在薩克森 (Sachsen) 希特勒都遭遇了最痛苦的慘敗。在薩克森邦中，邁根泰勒 (Mergenthaler) 教授與邦議會議員斯忒格 (Steiger) 所領導之大部份的國社主義者都脫離希特勒希特勒手中所剩餘者祇有斯多德牙爾的地方支部了。

可是，斯特拉塞仍然繼續擴展他在黨中的勢力。希特勒不能夠做到使北部接受關於任命地方支部的首領應由中央總機關主持。北部德國人，仍同過去一樣，自己選舉他們的首領，而選出的首領往往是斯特拉塞及其朋友們所挑選的人物。在這年九月，斯特拉塞在魯爾做一番大活動工作。在活動工作進行中，他於來因蘭一個平凡的小職員身上發現一個新的天才者，他立刻加以認識：這個人便是保羅約瑟夫戈培爾博士 (Dr. Paul Josef Goebbels)。愛爾柏斐爾城 (Elberfeld)

之北來因蘭黨區的書記。他們兩人彼此間發現到大相接近的見解，這一點便引導他們組織共同反對慕尼黑的戰線。基於這個目標，他們創立了在國社黨內部維護社會主義的理想之一個新的機關：『國社主義文藝』一種半月刊，牠是不在外面公開發售的。第一號是於一九二五年十月一

日出版；總編輯即是戈培爾。

的。
那是斯特拉塞與戈培爾之共同的見解呢？他們乃是社會主義政策的信徒並且是傾向俄國的。

『未來是屬於社會主義理想的國家中之獨裁政體。』這一句話并不是錄自 Rote Fahne（共產黨機關報），而乃是錄自一九二五年之人民觀察報，並且是出於戈培爾博士的手筆。確實是不帶任何成見的，他甚至覺得『階級鬭爭，同歷史上一切的事實一樣，有它的好的方面，也有它的壞的方面。』而在一九二五年四月底，斯特拉塞在希特勒所擁有的機關報裏面，承認一九一四年之老社會民主黨曾經確實成爲一個莊嚴的政黨，他說：『我們應該記憶這幾百萬人的這種忠誠，這種猛烈的虔心，這種興奮情緒，唯有他們能夠剋服這些日子（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的慘楚的苦痛，並且釋明那裏面的理由，而繼這種苦痛而不久後跟來的，是由國民的悲憤所產生的疑雲與恥辱。』一九一八年的斯特拉塞，好像幾乎是馬克思主義者了。唯有一個失望的情感，纔產生這種忿懣呢。

『這個因有像伯比爾 (Bebel) 那樣熱烈的性格所發揚光大的政黨，幾千顆情緒興奮的心是在那裏面犧牲了的政黨，卻變成包爾 (Bauer) 和黑爾曼 (Heilmann)，里克脫 (Richter) 和巴爾馬特 (Barmat) 的政黨了！』這種話當然表現了不同於希特勒佈道的聲調，後者是說猶太人用馬克思主義毒害了德意志工人，在大戰前即已經有撲滅社會民主黨之必要了。

斯特拉塞具着一種帶政治性質的固執，那裏面對於各種事物有着純淨的和自然的感覺，而他以此反對羅森培之俄國式的反猶太主義。他於十月中在人民觀察報上面寫道：德國絕不應當向西方尋求援手，牠絕不應當支持美國的資本主義和英國的帝國主義而反對俄國。凡是與凡爾賽對立的都是德國之天然的朋友與同盟者。德國的地位是與新生的俄國爲伍的，是與土耳其、中國、印度、喀比里族 (Kabylas) 和德律斯族 (Druses) 等等爲伍的。世界上祇有凡爾賽的保衛者或凡爾賽的敵人這兩方面。既然俄國也是反對各種條約的，牠便是德國的同盟者了；牠自己所採用的制度是與旁人毫不相干的。

居留德國的白俄人是不願意聽這種話的，他們便以忿恚萬分的抗辯大肆攻擊人民觀察報

的編輯部。聶米羅維赤——丹真戈博士——斯哥羅巴斯將軍之情報處主任——便攻訐斯特拉塞沒有智識，好像不會懂得俄國現在是不存在了，而所存在者唯是一個猶太的鮑爾雪維克主義。羅森培在編輯部所發表一篇短文裏面，向忿怒的俄僑與玩社會主義的武器之同志，極力調解，他說：我們希望讀者知道『我們認東方的鄰國是一個猶太的劊子手的殖民地。』但是，處眼前的狀況之下，大家應當絕對避免有德國干涉俄國的可能性。此外，外交政策是絕不能帶有武斷性的。

羅森培不能夠公然禁止斯特拉塞，他於是轉而攻擊年輕的戈培爾之疏忽的過度行爲。戈培爾曾虛構一篇與共產主義者談話的文章，在那裏面，他將斯特拉塞之實際的外交政策變成一種戲劇的筆調。他劈頭說道：他沒有必要向他的共產黨朋友表白說他之估量人民與民族是與大肚子上面掛一條黃金練子之愛說話的先生所估量的完全不同。俄國工人委員會的制度——現在是絕不近於廢棄——不是國際所共有的，而乃絕對是俄國的。沒有一個沙皇能像列寧那樣深切了解俄國人的心靈。列寧曾犧牲了馬克思，而以自由給與俄國，即使是鮑爾雪維克主義的猶太人，也承認有俄國國民政府的存在之絕對的必要。下面一段話，在國社主義的觀察點上，是近於邪說

的發明：『事實上，猶太問題之複雜，是遠在人們意想之外。資本主義的猶太人與鮑爾雪維克主義的猶太人或許不是一個唯一的和同樣的人物。』

這樣的說，戈培爾不會注意到他所主張的話已經幾乎不是反猶太主義了嗎？無論如何羅森培總不放鬆這個錯謬；不對，戈培爾、列寧不會以自由給與俄國農民啊！今日的俄國不是屬於國民的，牠是處在第三國際統治之下，而即使在倫敦猶太人、紐約猶太人與莫斯科猶太人之間有衝突之存在，俄國的政治總是猶太人的政治，而鮑爾雪維克主義乃是純粹猶太人的創造品。俄國是，而且眼前繼續是，鮑爾雪維克的猶太故土。

雖然如此，斯特拉塞在某一時期中，終於做到使人接受他的各種意見，作為國社黨之正式的政治方針。唯有一點上：關於南提羅爾問題，希特勒曾與以干涉。因此，斯特拉塞於十一月二十四日在國會所作反對羅加諾 (Locarno) 條約的演說裏面，他所不提到的話，其趣味是不在於他所提到的話之下。他說：『我們國社主義者，前線的兵士與軍官，永遠不放棄亞爾薩斯羅崙 (Alsace-Lorraine)，歐本 (Eupen) 與瑪爾美地 (Malmedy)，薩爾 (Sarre) 以及我們的殖民地；我們

之不放棄北部什列斯威，也與我們不放棄沫美爾（Memel），但澤波森、東部普魯士以及上西勒西亞各地一樣。我們不因爲好話而犧牲了我們在奧大利的同胞與蘇特的德意志。『清單是很長的……可是南提羅爾卻不曾提起。』希特勒曾加以干涉。反之，在跟下去一句話裏，反對干涉蘇維埃、俄羅斯的斯特拉塞，卻直言無隱了。

五 希特勒之與格拉夫宣戰

希特勒雖然猛烈反對民族派黨人的企圖，但他卻不作挑釁行動。祇要他們不在南部擾亂他，他便可以放任他們在北部爲所欲爲，況且他們在北部是與斯特拉塞發生競爭的。到一九二五年六月，國會裏面國社黨黨員甚至於加入人數較多的格拉夫信徒的幫中。

這種策略是基於一種默約所定，民族派黨人不在慕尼黑擾亂希特勒，但他們卻不曾遵守約定。因此，希特勒決計從新搗亂敵人的集會。他自己親身帶隊討伐格拉夫與烈芬特羅伯爵過於輕率的想，在何夫博羅酒店演講，希特勒便同他的忠實部下在那裏面出現；他登上一張桌上，口中不

發一言，祇指手畫腳和發冷笑，隨後便發生那麼重大的混亂，特別是因爲婦女們的驚悸呼聲，因而使警察出來驅逐大家出場。烈芬特羅站在講臺上，神色嚴厲，目送一大隊警察背後所經過的劇情。當希特勒退去時候，他向後者喊道：『再會吧！』

六 哈諾瓦之內訌

反對民族派黨人的鬭爭從新開始後，斯特拉塞再不能夠維持北部的活動了。他於是想法使他的部下脫離民族派，並且向他們提出同時兼有社會主義的與國家主義的目標。他於戈培爾之外，又在他的兄弟渥托斯特拉塞（Otto Strasser）——從前是社會民主黨份子——身上，找得一個可貴的助手。在那個時候，幾乎在德國北部與東部之所有國社黨各支部裏面，都有着帶斯特拉塞色彩的社會主義者。他們是屬於在各黨中所經見的那種參加份子，一向便不會看過黨的綱領，也不會看過委員會的佈告，他們之加入政黨無非是基於後者的傾向，而不是基於後者的各種理論。到現在，他們認爲有尋求使這個新的傾向具體化的綱領之義務。這個便是斯特拉塞以十一

月二十二日在哈諾瓦所召集之『德意志北部黨區大會』的任務了。

在這一次會中，已經現出有兩個國社黨：一個屬於希特勒，一個屬於斯特拉塞。哈諾瓦黨區首領魯斯脫（Rust）便會宣稱說，北部的德國人是不願意自處於慕尼黑教皇統治之下的；在『教皇』這個字眼裏面，實充分表現了對於巴伐尼亞天主教徒之希特勒的敵視的情緒。大會改成爲德國北部與西部各黨區的集合體。費德便以觀察者的資格從慕尼黑來會。他一向會打擊共產黨的朋友之戈培爾的神經；戈培爾卻表示說，當大家以朋友的關係在那裏碰頭時候，最簡單的辦法是招待費德。實際上，希特勒的使者不能參加一句話進去。斯特拉塞闡明一個廣大的對外政策和社會主義的政綱；除南來因蘭黨區首領雷伊博士（Dr. Ley）外，全場一致通過。可是，還有比這個政綱更見重要的，便是大家所認爲應當採取黨在國內活動的策略。這個策略是直截了當的，被目爲慘劇政策。國社黨應當歡迎一切可以搖動政府的權力的行爲，不管它是好斯敦農民所拋的炸彈也好，或是共產黨工人的罷工也好。

到最後地步，希特勒或許接受社會主義的政綱和對俄國協調的政策。他從經驗上知道有多

少人，一到事能嚴重了，便很少受主義的支配，他也知道有多少政綱，到了政黨發展後，便被拋棄了。然而他不能夠贊同宣言裏面認藉重暴動和炸彈爲正當辦法那一段。他現在還受着緩刑三年的待遇，說不定一二年，他便可以被驅逐出境。況且，在本年年頭，奧大利政府曾宣告取消他的國籍；他現在是絕對的無祖國之人了。若果他不顧炸彈炸他本身的話，他便要從北部德國人的手中將炸彈拿走。

同當局發生關係，像他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那樣，現在對於他是多麼有用處啊！丁脫在屠麟根想法同右派各政黨發生密切聯絡。他結果是失敗了。而挺進隊各隊——黨的權力之另一個工具——是破裂了。黨所剩下之可以相當的引起羣衆的注意者，祇有了褐色的衣衫。他是羅斯巴克中尉於一九二四年所構想出來的，希特勒本身當幽禁於蘭德斯堡時候也會穿着。現在牠卻成爲羅斯巴克的同伴亨斯中尉之經濟來源的工具，後者乃開設一家出賣褐色衣衫的貨店。

七 希特勒在政治上與在愛情上之不幸

這一年頭對於希特勒是在淒涼中結束，也正如這一年開頭時候一樣。他所著的書我的鬪爭史頭一本是於六月間出版。但是他呢，一向是一貧如洗，現在想太過度的賺錢。這本書每冊定價十二馬克，價錢是太貴了，而在好些年中，很少賣出去。

另有愛情上的痛苦，益發增加這些愁悶。他曾對於慕尼黑社會的一個年輕的女子發生了不幸的愛情。他之有幸福的敵人乃為慕尼黑大學之一個著名的教授。若果在那個時候沒有發生希特勒和一個猶太種的女人訂婚的謠言，或許這件事情便不傳到外面。在十月中間，人民觀察報覺有發展一篇更正之必要，那裏面是說：訂婚的故事從頭到尾是一篇撒謊；進一步說，所涉到的人物，X……女士（她的姓會發表出來）絕不是原籍猶太的人。

在這一年年底，當他談到社會主義的強有力的運動，他發出真合於人道的口氣：這是第一次而且是最後一次。

『馬克思主義者』他於十二月在斯多德牙爾所開的大集會中說道：『有他們個人的世界觀念，固然是大家也都有着。我們應當以民族主義的觀念與他們抗衡。到了資產階級得到社會正

義之熱烈的認識後，我們才算達到目的。若使資產者們還是認破費金錢的專實爲一種犧牲，他們便沒有權利使他人捐流他的血。因爲社會理想并不求人犧牲，它所求者乃是恢復社會的正義。』

一篇好聽的話。在那樣大吹大擂後，它卻從希特勒口裏，幾乎是悲慘可憐的，發出溫和的聲音。在同樣的情緒之下，他在巴伐尼亞之一個耶穌誕會中說道，到國社主義的理想勝利時，或許是經過二十年後，甚而至於一百年後。今天相信這個理想的人們很可以死掉：在一個民族的，人類的進過程中，人壽是幾何呢！

當希特勒回想到一九二五年，他當不免雙淚盈眶啊！

第八章 一九二六年

一 希特勒之組織衛隊

希特勒在一九二六年年頭，實不自知到這年底他是否永遠居於他的政黨的首腦地位。在人數單上，國社黨擁有三萬黨員，但這些黨員不是屬於希特勒的，他們是操縱於他所不能倚靠的部下手裏。唯有南巴伐尼亞那一部份是他所靠得住的。佛蘭黎（Franken）區域成爲國社黨之最堅固的堡壘。在一九二五年，在入黨者的數目上，努連堡已經是超過慕尼黑。斯特萊撒在市議會裏，甚至使民主黨份子呂蒲（Luppe）市長感覺不安。可是他許任何人侵犯他的地盤。在屠麟根，希特勒的心腹丁脫同他的部下發生鬪爭；主持薩克森黨務的富實業家慕赤曼（Mutschmann）不能解散叛變的東薩克森黨區。瓦敦堡黨區是破毀無遺。巴登黨區仍然奉命，但牠的力量是很薄弱。

的。德國北部乃是國社黨腹部大傷口所在的地方；在那邊，靠着九個反叛的黨區，斯特拉塞組成了國社黨內之一個政黨，他還不能決定到底是完全脫離希特勒，還是乾脆的廢立後者，請他到無能為害的名譽總理的位置。

他曾於烈芬特羅伯爵面前訴說，他覺得對於希特勒有了更密切的接近後，便發現到後者不過是一個演講家，而不是一個政客，也不是一個政治家。他永遠是躲避政治上具體的決定，他所宣傳的主義，與其說是政治的，無寧說是哲理的，一切如此情形實使人不能同他合作。斯特拉塞自以為如果他本人同戈培爾在希特勒面前提出兩個供他選擇的辦法：或是從新分割彼此的權限，或是彼此決裂，則希特勒將要讓步，而且情甘接受名義的總理與黨之第一演講人的位置。

我們應當考慮到所有這些黨的領袖，所有這些謀反者，並不是飽經閱歷的政客，而乃是市井的人物，滾入政治的漩渦；他們心中的觀念是不會經過一番良好的消化，而他們的希望是龐大異常；他們尤其是不懂得在政治上一切功效祇能緩緩得到，而卻戀戀於紙上最輕忽無謀的計劃。在一九二五年，斯特拉塞於熱望理想的羣衆裏，得到發展過速的成功。這個人會一下

子獲得一萬信徒，他必是容易忘記這總不過是一百萬中之一小部份而已。斯特拉塞還不會遇到一個堅決的敵人，而他卻爲幻想所迷糊，以爲黨內各件事情都是很容易做下去的。然而在這個時候，希特勒注全力於黨內部經營一種保護個人的一種力量。

在眼前這個時期，人民觀察報幾乎是希特勒所擁有之唯一的物質的基礎。在一九二六年年中，他做到脫離債權人的羈勒。到一九二七年年頭，他可以說人民觀察報在財政上是獨立的。因此，在一九二六這一年中，他之全副宣傳的力量不是費於徵求新黨員，而乃費於徵求人民觀察報的閱者。

S. S. 隊 (Schutzstaffeln 衝鋒隊的簡寫) 牠也須分擔這個宣傳的任務。從幾個月來，在慕尼黑從新成立一個小隊伍；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希特勒要求在黨的勢力所及的所有各地方，改組 S. S. 隊。後者是繼承 S. A. 隊 (挺進隊) 的。以黨之正式承認的唯一的隊伍而言，牠的任務爲壓倒並且到處吸收如挺進隊、羅斯巴克義勇隊等等舊份子的小團體。因此，非常的慎重須爲牠的編制之主宰。當從前組織挺進隊的時候，所發的口號是：『本黨希望各同志一致參加』現在口號卻改

變了：『本黨指導機關所根據的原則，是一個精選的和堅決的人物所組成的隊伍是超過萬萬於一堆無數的傀儡和無毅力的人物。因此，參加衝鋒隊須經過極其嚴厲的條件，而且牠的額數須有嚴格的限制。』

後來，衝鋒隊之對於再度成立的挺進隊所扮演的任務，實等於監守隊對於前線隊伍的任務。眼前，牠還是人數稀少的隊伍，因為希特勒祇許的確忠實的人們加入裏面；在各黨區裏面，在不甚可靠的文人之中，這些人是代表一個清白份子的核心；他們維護希特勒的主張而反對斯特拉塞的主張。因為這個原因，所以在起初時候，衝鋒隊不會發展到巴伐尼亞境外。牠的首領為從前希特勒突擊隊（Stosstrupp Hitler）的首領，且為希特勒的老友柏克托爾。在五月間，於威馬爾所開國社黨大會裏面，希特勒於尊嚴的形式中以『血旗』授與新隊伍，即是在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九日曾受槍火的旗。

這些選拔出來的人物，後來將自命為民族之新的貴族階級，而眼前卻被派擔任極其平凡的工作。無疑的，他們保護國社黨的集會。可是，在眼前，武力鬪爭和街上討伐敵人的時期是過去了。所

以在成立衝鋒隊宣言裏面，曾經說明衝鋒隊的主要目的是在於：『爲人民觀察報吸引訂戶和廣告并且爲黨吸引黨員。』

當眼前這個時期，在『血旗』下，前進着一批辦理廣告的人員。

二 主人翁之反對奴隸

假使我們試將瀰漫一九二六這一年的關於黨所應遵循的思想的途徑之熱烈的爭論總括起來說，我們或許可以概括如下：在民衆的擁護者與領導階級的擁護者之間，發生一種積極的對立。前者自命爲社會主義的信徒，不過在社會主義這個名詞加上一種迥異普通所指屬於馬克思主義的意義；他們夢想一種全體擁有平等的機會之有產的大衆共同體，而所謂平等的機會并不繫於有形的財產之擁有。在黨裏面，意見的對立所演成的形式，實爲工人與『大學堂出身者』彼此間的爭論，婦女權利平等或爲男子之附屬品這個問題的爭論。這種對立也擴展到外交政策方面，在這方面，羅森培受他的反猶太主義的推動，而主張屈服於盎格魯·薩克遜的國家的統治之

下，他所引爲自慰的是後者曾確定了亞利安種族的無上權；可是斯特拉塞卻想使德意志民族領導一切被壓迫的民族，恰恰是爲着抵抗盎格魯·薩克遜民族的統治。所以，卽在這種地方，大家看到奴隸反抗主人的鬭爭。

至關於婦女問題上面，國社黨自從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起，決定任何婦女不得進入黨的指導機關或執行委員會，牠已經採取極其顯明的地位了。上面的決議也已經爲當場各婦女非常高興的表示贊成了。然而，從此後，情形又稍爲發生變化。

國社黨不會擁有一個婦女的團體；不過，牠卻有一個友好的團體，卽愛爾斯伯特·山德(Elisabeth Zander)所領導的『德意志婦女團體』。牠的口號是：德意志婦女不應要求權利，而應要求義務。黨的另一女同志，哈德利克博士(Dr. Hadlich)卻起來激烈反對這個公式。她說道：從前日耳曼婦女在男人的會議席中會有積極的參加，而且往往是果斷的參加；但現在卻盛行男性的私心的道德觀。大家不應當提高男人或女人，而所應當提高的是德意志人；婚姻與母道不應當卽於襁褓時期中便指爲婦女之唯一可能的前途，而婦女實應當進入公共活動之所有各部份以及

各種負責任的位置。因為男性當權，所以關於種族問題，犯了對於現時代國家之不認識的毛病。

羅森培對她施以嚴厲的反駁，他說：「這個地方便是人道的德謨克拉西主義；人們便是用這些論證來創造『第三種性別』；至於涉到從前日耳曼人上面，顯見發號施令的是男子，如西格斐力·巴爾杜及羅奇（Lohé）等人的榜樣可為明證。婦女的使命乃為增加德意志人的生活之興趣，至於關於營造術方面則保留給男人。」

哈德利克女同志覺得這個反駁是大奇妙的，而是無甚意義的。她力言說，在黨內，那些人是「絕頂東方化的國社主義者，因為壓迫婦女，正是導源於猶太民族的呢。」

羅森培粗暴的回答說，哈德利克夫人的見解乃是達爾文派之老朽的餘瀋，他而且說，本黨指導機關到適宜時候將公佈牠對於本問題的意見。

三 斯特拉塞之被馴服

如果希特勒想保守他的領袖地位，他需要避免以中立人的資格干預黨徒這些爭論，免使他

的地位受着影響。他不能夠殲滅敵人，但一到後者現出威脅的態度，他便可與以重大打擊。這便是後面所發生的事情。

那個時候，在德國產生一件重大的政治運動：即反對給付各皇子賠償費的運動。實際上，這是反對保守勢力的鬭爭，即革命時期所不能不擱起的鬭爭。現在呢，牠可以用合法的手段再來鬭爭。領導這個攻擊運動的，即是共和政府——牠的新「大元帥總統」（興登堡）曾已承認黑紅金黃三色國旗——的各首領；反對者德意志國民黨本身，曾已接受保護共和政府的法律，而且後幾年牠也不能不正式批准處分廢皇的流刑。北部的國社主義者裏面，便有許多人參加反對皇子的運動；這是毫不足驚異的，他們裏面許多人是舊的共產主義和社會主義的份子。

尤其是渥托斯特拉塞博士起來激烈反對給付賠償費，並且要求國社黨人維護民衆的請求。希特勒便於這個問題下面找得置北部反對黨於死地的工具了。

二月十四日，在班堡開全黨各領袖大會。北方人到會的祇有兩個人：斯特拉塞和戈培爾，其他領袖則托辭旅費昂貴不能到會。照實在情形說，那時候之各黨區領袖在空閒的時間中儘量盡他

們的職務，而他們不出外旅行，除了可以希望從收有入場費的集會之盈餘項下取回他們旅行的費用。希特勒所選擇的地方又是班堡，乃爲屠麟根、薩克森和巴伐尼亞的黨區領袖所容易去的地方。

非常靈巧的希特勒知道尋找主張沒收各皇子財產者的弱點，找得後，他便下毒手。他於是說，這種煽動乃是一種撒謊。我們可以先注意沒收財政界、交易所和商界之非德意志的皇子的財產。因爲這個原因，求避免受這種攻訐起見，國社黨各議員於四月底向國會提出一個議案，那裏面第一條是說：『銀行和交易所的大王，從一九一四年八月一日以後移入德國境的東方猶太人，以及所有其他的外族人的全部財產，和從這個日期起，因利用大戰、革命、貨幣膨脹和貨幣緊縮等等而獲得的利益，全部無賠償的沒收入官。』

希特勒還懂得找出其它的理由，雖然那裏面不能表示什麼意義，但發出來是很響亮的：凡是屬於皇子們的，我們分毫不得給與他們。但凡是屬於他們的，我們沒有權利取其分毫。『因爲我們是站在法律的立場上說話。』然而，任何人不得根據這種態度斷定黨是偏向於君主制度；政府

的體制乃是次要的問題，幾乎是像軍隊的制服選擇顏色的問題一樣。

上面是用很見輕蔑的口氣談到君主身上，可是反對黨方面是被掃蕩無餘了。一個月後，黨的指導機關公然佈告說：『國社黨黨員無須參加猶太人所組織的國民投票。』

無疑的，在那個時候，北方人不會知道希特勒曾希望藉巴伐尼亞王子的援助使十一月九日的暴動得以成功。他們所知道的僅是黨內所傳佈的故事，照那裏面所說，這次暴動反是為預防君主主義者的苦迭達而發生呢。

這樣，希特勒便以高壓的手段，終於做成打倒北方的反對黨。然而他不能做到強迫斯特拉塞取消其它各項問題；後者且繼續堅持說，不應用一種盲目的反鮑爾雪維克主義以擾亂民族青年的思想和心理；上面這個情形正是資本主義政權所施行的巧計而產生的結果：這個民族青年本來是與榨取者的制度無絲毫關係的，竟於不知不覺之中，變成這個制度的藩籬。

希特勒用嚴厲的聲調回答道：這個人因為對於現在的俄國到了這樣不認識的地步，所以能夠主張德俄聯盟，這個人卻不會想到這一類的聯盟的意義即等於德國立刻鮑爾雪維克化了。希

特勒呢，卻追求同意意大利聯盟。在他看去，南提羅爾問題不足成爲同意意大利直爽的和公正的談判之障礙。想用武力收復南提羅爾簡直是一種妄想，爲的是所費的代價過高，而得不償失了。不能憑着感情作用，進一步說，墨索里尼是傾覆德謨克拉西之意志堅強的人物，而因此博得全世界的祕密結社的仇視。

四 戈培爾之背叛斯特拉塞

希特勒不但壓倒北方的反對者，他而且獲得一個新同盟者：戈培爾；在班堡大會中投票決定應取的步驟時候，戈培爾竟傾向於費德，於斯特萊撒，於希特勒。敵方營壘裏面，祇剩下斯特拉塞一個人。戈培爾之背叛斯特拉塞，也無非是效法後者於一年前對格拉夫所作的舉動而已。從這一天起，斯特拉塞同戈培爾結下至死不解的仇恨。希特勒之所以能夠永遠掌握國社黨的指導權，實基於他們兩人之彼此對立，而希特勒便懂得在這個對立的局面中，運用他的巧妙手腕。

斯特拉塞雖然在班堡失敗，他終不放棄鬭爭。一九二六年三月一日，藉他的兄弟的幫助，他於

柏林創設一家出版社，名為奮鬥出版社（Kampf Verlag），後者後來竟然曾於一天之中印出五種國社主義的報紙。這幾種報紙之中最重要的是柏林工人報（Berliner Arbeiterzeitung），牠是一個週刊，為渥托斯特拉塞所主編的，裏面的筆調或許稍為呆滯。這個報紙，與其說是鬪爭的，無寧說是富有理想與教育的報紙，但是在持論誠實上以及議論之豐富上，牠是遠優於人民觀察報。

然而，這樣的建築出版業的堡壘，或許是下手太晚了；不然就是哈諾瓦的進攻是下手太早嗎？斯特拉塞兩兄弟很可以在德國北部經營一個政治的地盤，希特勒很不容易從那裏面把他們趕走；但是奪取希特勒在慕尼黑的地位，使之退到名譽總理的位置，這種希望暫時是不能放棄的。戈培爾之所以叛變——挺進隊一個首領斐佛大尉形容這個舉動為『絕無僅有的反叛』——是因爲他自己明白斯特拉塞雖然眼前領導德國北部，但未來總是屬於希特勒的，因爲後者擁有最強有力之物質的準備。在眼前，戈培爾須出去外面，希特勒先派他在巴伐尼亞，隨後在瓦敦堡活動。

五 埃塞之下臺

當戈培爾在國社黨內部開始他之新的生涯時候，同時和他有許多共同的見解之另一個領袖，卻不能不在數年內中斷他的同樣生涯。後者乃是海爾曼·埃塞。埃塞曾在努連堡國社主義者的社會裏面惹起曖昧的情事，他和國社黨一個保護者的夫人發生猥褻的關係。因為人們以這一件事情責備他，他反辯說這種關係可以使他在困難的時期中，以希特勒所不會歸還他的金錢借給國社黨。

假定事實果然是正確的話，牠將向運動方面給與嚴重的損害。埃塞於是不能不答應希特勒說他立刻離開努連堡。可是他仍然不履行他的許諾。希特勒不禁發怒，聲言他的寬仁的態度現在是到了最終的地步；他前此已經因為埃塞而犧牲太多的好朋友了。他不願意再見這個青年，至少在後者未曾從新拿出良好行為的證據之前。當然的，我們對於這些話不能認真相信牠的字面。希特勒是不能夠摒棄他之含有危險性的心腹的。情形雖然如此，但從這個時候起，經過很長久的時

期，埃塞是離開了國社黨中央指導機關。

六 新的黨規

從班堡大會以後，希特勒很可以自誇爲戰勝者且爲唯一的主人翁；但這個絕對的主人翁地位，乃建築於虛無飄渺之中。他雖然曾召集了好幾次會，但在德國政治的生涯裏面，事實上國社黨是被淘汰了。原因是在於一個政黨的生命不但是與參加的人物有關，而且與大幫的冷淡的羣衆有關，最低的限度是不要受後者對牠取反抗的態度。當一九二三年，註冊的黨員的數目並不高過於眼前這個時期，但有無數的表同情者，均熱望新的運動能够成功。到一九二六年，希特勒的徒衆祇可倚靠他們自己本身了；德國羣衆不會對他們表示惡感，而所表示的乃是不在乎的態度。卽是各個信徒，也彼此低聲談論希特勒主義的死亡。比較一九二五年改組時候，眼前環境是更見惡劣；在一九二五年那個時候，大家還懷着若干成的希望，那時在國會裏面還擁有十四名議員，並且在國內還有一大批可以成爲信徒的預備隊。現在呢，在繁榮的陽光下，後者是鎔解了。天天產生新的

叛變。老朋友又棄他不顧了：克利伯爾滯留於克倫地亞（Carinthia），布魯克勒接受了德僑聯合會的一個職務，羅姆服務於製造鋼軌工廠。所有那些從前爭前恐後的追隨希特勒之重要人物，現在都離開他了。巴伐尼亞的資產階級，當一九二三年時候，是同情於希特勒的，現在卻視前此種種為瘋狂行動，而心中感覺慚怍，從前之挺進隊份子，遇到人家對他們提起過去的舉動，便現出不安的面色了。

處在這種黯淡的環境當中，非有偉大力量的性格，便不能免喪失勇氣。然而這個勇氣恰恰是由黨所處的環境造出來的。希特勒或許已經願意同民族派妥協，祇要後者們會想要如此；假定斯特拉塞兩兄弟是處在黨的主人翁的地位，而不必憂慮到在妥協的局面當中他們將成爲被犧牲者，那麼，他們或許也做了妥協的活動。便是因爲各領袖間有這樣的對立，竟然維持了黨的完整，並且使牠保有生機。

現在希特勒想用盡所有意想所到的安全方法來維護他在黨的權威。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二日，在慕尼黑開了一個全體大會，會中採用了爲希特勒而設的新的黨規。爲使北方人的幻想的

花樣永遠消滅起見，大會宣佈黨的綱領是『不可觸犯的』——而便是希特勒在他所作幾次演講中曾經指摘內中有許多錯誤的綱領。可是牠的永遠不變的各條，便從此成爲環繞希特勒的防衛的藩籬了。

按照新的規程，黨之合法的代表者乃爲在慕尼黑註冊的德意志工人國家社會主義協會。協會的領導機關同時掌握黨在全國內的總指導權與慕尼黑地方黨部的指導權；這樣，在黨內，這個地方黨部便處於優越的地位，並且處於希特勒直接管理之下。他那方面，在黨中，指定一切勞動者的聯合爲目的：『藉使在我們民族內部，實現了可以使這個民族恢復他的政治的與經濟的獨立之初步的條件；依照協會的綱領，可對於個人，猶對團體一樣，培養其精神與毅力，以達到上面所說的結果。』黨的組織之第一元素爲地方黨部；聯合幾個地方黨部而成區黨部；『爲求得運動之一個強有力的指導機關起見，協會的主席，即黨的總理，是頭一個對這個指導機關負責的。』

全國的指導機關內面，分設一大批委員會：宣傳、青年、體育、組織、財政各委員會。黨的總理——便是希特勒本身——任命各委員會的主席以及後者們之若干助理。全國指導機關的任務是由

『執行委員會』主持，後者是內下列數人組織而成的：第一總理希特勒，情報部長與總會計（兩個毫無勢力的人物）；隨後便是上面所述各委員會的主席，最後是秘書長（另一個奉承希特勒與毫無政治勢力的人物）。執行委員會祇對全體大會負責。

第八節是饒有趣味的，因為他賦予黨的十分之一的黨員以請求召集非常全體大會的權利，在非常全體大會召集時，執行委員會須向牠報告活動的情形。

爲保障慕尼黑黑得在黨中施行獨裁權起見，於是下了三個重要的決定：第一，各黨區的領袖應由希特勒選定；這樣，『往日之德謨克拉西式的積習』會使各黨區得自己選舉牠們的領袖或至甘受斯特拉塞的支配，現在可以不成問題了；第二，決定從新組織挺進隊，體育委員會的改組便是爲着這個目標。衝鋒隊不會得到他們對牠所期望的功效，爲着是牠的首領柏克托爾在全德國境內缺少了權威。新挺進隊的指揮權是交與退職大尉斐佛（Franz Felix Pfeffer von Salomon）。直到這個時候，斐佛在魯爾黨區充當希特勒的觀察者，這個黨區乃爲斯特拉塞之最大的采地。第三，希特勒創設『烏施拉』（Utschla）（調查和解委員會 Untersuchungs und Schlichtung-

sausschuss 的簡寫) 可以說是國社黨的『捷加』(Tcheka) 這個委員會的正式任務在於提出和平解決在黨的內部所發生的意見與糾紛的方法，而牠的偶然的任務是對於請求入黨的人們作各種調查。牠在政治上的重大的重要性是基於下面這個事實：得牠的同意之下，第一總理可以整個的解散地方黨部；可是，不僅委員會的主席，而且連後者的助理，全是由第一總理任命，總而言之，委員會是在黨之上的絕對的統治權之一個工具；然而，在表面上，卻保留着各黨員的權利——表面上似乎是一種人種的權利——是操在一個德謨克拉西式的委員會手裏的現象。烏施拉的第一任主席爲退職中將亨涅曼(Heinemann)；從一九二七年起，繼任者爲退職司令官瓦爾脫·培克(Walter Buch)，一個完全忠實於希特勒的人物；他的兩個助理爲格拿夫(Graf) 和律師法蘭克第二(Frank II)，也是對希特勒絕對忠實的兩個信徒。在國社黨裏面，烏施拉是變像希特勒之黑暗的記室。與牠相類似的委員會也照樣在各黨區的領袖之下設立着。

第十二節包含了一個策略上十分重要的條件：從其它的團體或政黨出來的集團，非放棄他們過去的特權，不能接受他們加入國社黨。這一節是針對其它民族派的政黨，預備在時機到了時

候，可以安穩穩地吸收他們的殘餘。

新黨規是以七月三十日在慕尼黑註冊。黨的中央威權便這樣堂皇地在巴伐尼亞首都確定了。斯特拉塞戰敗了。他從新空費力量跳入戰場，不倦地旅行和演講；一年之中，他在一百八十個會裏發言。然而，從這個時候起，斯特拉塞不再爲他本人努力，而是耕種他的主人翁的葡萄園了。

爲慶祝他的勝利起見，希特勒於七月初在威馬爾召集國社黨大會。新國社黨全體出來與大衆見面，這是頭一次。大會聲稱是『堅決反議會主義的』。在一年前，這是不可能的，因爲在那個時候，巴伐尼亞的希特勒若是以領袖的態度與北方各首領相見，後者們將當面大肆嘲笑了。

不過，在眼前這個時期，希特勒的獨裁野心實會使國社黨消耗盡了。國社黨從來沒有到過像這一次威馬爾軍事檢閱那麼窮窘的地步。穿着奇異的制服從所有各黨區來的挺進隊份子，其人數并不多過於希特勒於一九二三年一月二十九日在慕尼黑學校場所檢閱的挺進隊。而在那個時候，那裏面僅是巴伐尼亞人。在威馬爾，人們便又談到『國社主義的沒落』了。

可是希特勒本人是有他的道理的。他寧可願意指揮三千人，而不願意同三百萬人談判。國社黨很可以在若干時期中淪於衰頹的狀態。國社主義或許已經「死掉」了，而希特勒的健康也從來沒有這麼好的。

七 希特勒對德國經濟界的演講

現在國社黨在希特勒面前，呈現一塊荒地的現象。他卻想在這塊荒地上面廣佈軌道和馬路等等的線網，希望并且預算很快的便再行建築起來了。因為這個，他須有金錢。在黨不會發展之前，一個馬克的註冊費與增加到八十分尼的黨費不能弄到很多的金錢。

在一九二六年夏天中間，希特勒使次第周遊魯爾各地，并在非公開的聚談會中，向地方上的大人物演講。一九二六年六月，他在愛森(Essen)演講；十二月初，在愛森和柯尼格斯因脫(Königsberg)，一九二七年四月，四百多人來到愛森城的克虜伯(Krupp)大廳聽他演講。

看到國社黨的首領絲毫不會向老闆們作他們所不能答應的要求——來因蘭·威斯特法

命日報 (Rheinisch-Westfälische Zeitung) 於批評六月演講時，便是這樣的表示着——這些社會便生了很愉快的印象，因為希特勒會宣稱，國社主義是維護私有財產的，並且認定自由的經濟是最有效力的，而進一步說，是唯一可能的。反之，他要求經濟界無保留的支持民族與國家的正義。

在一九二五年，德國經濟界的思想不是像它在一八九五年那個樣子了；我們若想了解希特勒對它所發的演講，便不應忽略這一點。那些大銀行團——可是照國社黨綱領的字面上來說，那是完全相反的——會使實業界領袖深切了解社會的實況，並使他們比較多用真理對待人類的器械。到了今天，雖然在許多自命為工業領袖的心裏，還存留着那麼幼稚的經濟概念，但是比較前一代所應用的小貨店的經濟學，這些概念已經表現向所未有的進步了。對於資本專制，古典派馬克思主義會很有道理的預言牠將急遽的崩潰，而現在牠卻變了一種比較大有柔性的權威，其原因便是在此。在許多開明的資本家看去，最有才能的下層的人物之昇入最高的職務，乃是本制度的目標，是保障這個制度之存在的最好的方法，且也是維持內部和平的方法。依照這個現時代的

觀念，資本變成社會的僕役，其程度是同勞動一樣，而勞動不應成爲資本的僕役，但也是社會的僕役。可是，希特勒所目爲國家社會主義，正是這種社會的組織：個人爲社會而犧牲，這是國家主義；社會爲個人服役，這是社會主義；這兩個聯合起來，便是國社主義了。

八 斐佛之不堅決的獨立意志

在這個時期中，斐佛着手組織挺進隊。

「我們應當取得紅色戰線的鬪爭精神，」一個年青的國社黨員，於一九二六年年頭，在人民觀察報上這麼寫着。這是與斐佛的意見一樣。

每個國社黨員須付十分尼的捐，專給挺進隊用的。在一九二七年年頭，亨斯的褐衫營業所被黨收買回來；收買的代價是亨斯及其羅斯巴克的份子歸併挺進隊。像愛拉爾特從前那樣讓步，羅斯巴克也讓步了。他再不想做鬪爭的工作，而專心組織一個業餘喜劇隊。衝鋒隊首領柏克托爾會有些時候搗麻煩，并且拒絕受斐佛的指導；他這個反抗態度便引起希特勒的狂怒，且甚至於動武。

到一九二七年，柏克托爾放棄了他的職務，而歸心於國社黨的新聞事業。

斐佛迅速地在黨內擴展他的統治。在一九二七年年頭，他逼使『希特勒青年隊』——這是由威馬爾大會決定創辦的——受他的指導。青年隊的首領古爾特·格魯伯 (Kurt Gruber) 僅成爲奧沙夫 (Ostal 希特勒挺進隊總司令 Oberster S. A.-Führer 的簡稱) 斐佛的代理人了。在斐佛的工作發展之下，他本人的勢力增大到那麼猛烈的程度，使希特勒認爲有予以打擊的必要。

希特勒不能採用其它的方法，他於是演出喜劇來了。在一九二七年四月，他公開宣佈說，關於挺進隊的一切重要的命令，經過奧沙夫簽署外，還須經他本人簽字，纔能發生效力。這是等於變相的譴責斐佛了，經過這件事發生後，斐佛唯有走辭職這一條路。然而事情是已經走到那麼遠了，使希特勒預先看到斐佛對於這種譴責將是絲毫不在意的。所以他還增加說，他對於不會經他簽署的命令將不負責任。而他說這種話，僅僅是在他正式宣言擔任國社黨一切行動的責任之兩年後呢。

原因是基於斐佛曾武裝挺進隊，并使挺進隊作軍事練習。希特勒隨時有被剝奪他所享受緩刑的待遇與被驅逐出境的危險。

國社黨經過了一個糾紛不寧的秋天。班堡大會僅是用不愉快的態度記錄希特勒的勝利。漢堡黨區在十一月被解散了，許多地方黨部也一樣被解散了。亨斯原為永遠不守紀律的傭兵，且無一點政治的意識，他也在慕尼黑，為反對希特勒的機警行為而叛變。到一九二七年五月，希特勒用激烈手段將他驅逐出黨，似乎是做給斐佛看到他所能做出來的手段。

九 戈培爾之被派往柏林

在區領袖施蘭格博士 (Dr. Schlange) 與挺進隊首領達魯格 (Daluge) 之無精神的領導之下，柏林的情狀是特別惡劣。柏林挺進隊裏面的一個首領亨斯·何恩斯登 (Hinz Hanens-tein) ——他在魯爾鬥爭中出名——會同幾個同志攻擊一個為他所不喜歡的黨員，并至於毒毆這個黨員。經斯特拉塞要求之後，何恩斯登及其同犯者均被開除黨籍。但是，雖然經過斯特拉塞

指明何恩斯登是警察當局所驅使的挑釁者，而柏林黨區的調查委員會卻替何恩斯登復權。直到那個時候，柏林方面絲毫不曾在黨內扮演積極的任務；而牠所做出真正存在之第一個舉動，便是不受節制的行爲。

希特勒便趁着這個機會派遣他的一個心腹到柏林去，而藉此將柏林從斯特拉塞的統治裏搶到手來。他解散了柏林和波斯丹（Potsdam）兩個黨區，而創設柏林——白蘭德堡（Brandenburg）一個新黨區，將這個黨區的指導權付與戈培爾。戈培爾之受到國社黨宣傳的最重要的位置，是在一九二六年十月二十六日。

同時，他又受到非常的權限。『戈培爾博士是對我一個人負他的行爲的責任，』希特勒宣佈說。柏林的挺進隊一向對於文人的大權是堅持牠本身獨立的態度，現在不能不屈服於新的區領袖，而達魯格也被免職了。

戈培爾對於他的宣傳活動之要堅持祇對希特勒一個人負責，這不是沒有理由的。因為，從九月中間以來，斯特拉塞充當全國宣傳部長，對於這個位置，斯特拉塞很愁悶地稱爲『黨的第二個

位置，『第一個位置是組織部長；希特勒將後者委任素無野心的人物之退職中將亨涅曼。雖然站在宣傳部長的地位，斯特拉塞祇能光明的行動；不能夠佈置秘密反抗的組織，不能夠在各黨區之間建立暗中的聯絡。

斯特拉塞在他新的職務中，曾想出幾個好主意。他以十一月九日暴動的週日爲黨喪日，藉以紀念犧牲於腓德赫恩的死者。他又主張所有國社黨黨員，在他們工作的時間之外，須顯明地佩帶卍字徽章，因爲這是做宣傳之最好的方法。

現在他在黨中做完全合法的活動；他深知唯有服從希特勒，他自己纔可出頭。他的兄弟渥托在柏林經營印刷所；預備一個國社黨新的綱領，這綱領的第一個原則是對希特勒宣佈獨立。這個新學說的散佈，曾對於國社黨的發展，發生了重大的影響，雖然這新學說的來源仍是秘密的。到了最後，牠的內幕被人揭開，渥托斯特拉塞不能不離開國社黨了。

第九章 一九二七——一九二八年

一 保羅·約瑟夫·戈培爾博士

希特勒之以柏林黨區付託年輕的戈培爾博士，不僅是以此酬報戈培爾在班堡和威馬爾所盡的勞績。戈培爾確實自認不但在主張上爲希特勒的信徒，甚且對希特勒個人，是崇拜到地的。

『至親愛的亞多爾夫·希特勒，他在班堡大會後，用一種微帶諂媚的口吻寫着：『我從你身上學到說不盡多少的事情。你帶着友伴的情誼，對我指示說不盡多少的新軌道……』而他便請求希特勒把他收入幹部裏去：

『各人是都在那邊。你把他們喊來罷。再不然，憑你在他們身上所認識的才具，一一加以選擇罷……爲的是或許有一天，一切都破壞了，羣衆圍繞着你，態度激昂并且高聲喊道把他釘死十字

架上罷。到個時候，我們都在那邊，懷着像鐵一樣的決心，而且唱着喊着荷散拿（Hosanna）歌！』

這個年輕的唱『荷散拿』歌者，若是像不久之前坐在司特拉塞作廢立希特勒計劃的革命者的桌旁，那就什麼都做不來了；他現在藉詈罵舊日的同伴，以恢復自己的本色：『現在，我知道你們到底是什麼；你們是大言不慚的革命者……我的志願從來不是這樣的……你們不要空談這麼多的理想，不要相信說唯有你們是這些理想的養父和唯有你們是 Grail 聖杯的守護人。你們學習罷，信任自己罷！你們相信理想的勝利罷！那樣，我們緊緊地站在這個理想的主宰後面，這便不是尋覓達馬（Damas）途中之回頭彼岸；那樣，我們俯伏他的面前，並不是爲着空洞的壓迫，乃是懷着這種面對皇帝寶座的人之舊日的自高氣概，乃是懷着這個安全的情緒，後者是基於我們知道他是在你我之上，而他也不過是這種神聖的意志之一個工具而已，即是在一個新的創造的愉快之潮流裏面，創造歷史之神聖的意志。』

戈培爾竭力採取領袖的態度，甚至在瑣碎的問題上面，譬如參加國會選舉的問題，他都採取這個態度。佛力克博士在一九二七年國社黨年鑑裏面，曾誇稱少數國社黨議員，在議會裏面，藉着

巧妙的提案，可以做出有效力的搗亂；戈培爾在一封公開的信裏，大肆攻擊佛力克的意見：

『丟開你們的議案能！我們的教義是用不着議案的！』而有一天，他便逢迎希特勒的想像，給這些議員以致命的打擊。『到選舉的時期來了時，唯有領袖一個人可以指定列入候選名單的人物。現期的委任狀只賦與靜候呼喚的權利。在這個地方，最出色的挑釁者將與黨的最出色打手更番輪替……到國會開重大會議時候，這二十名議員緊緊排在一堆前進。他們穩穩的站在議院講臺前面：十個喉嚨經過訓練的演講者，十個開聲動作的打手。有十個精於質問者便足使斯特萊斯曼先生狼狽不堪，而幾下適當的拳頭便可使紅色的或桃色的叫囂不寧的德謨克拉西——主張自由、平等與博愛的德謨克拉西——懾服并生出莊重的情緒。』

在這種分工的議會工作裏面，戈培爾祇替他本人保留質問的工作，而毆打的工作則留給比較強有力的人。矮小的身段，彎曲而經過改造的腳，他在同伴——幾乎全是純粹的軍人——之中，像巨人羣中的一個矮子，需要藉策術以救濟他的弱點。在國社黨的政治家中平均算來，戈培爾在智慧上是高出他們，可是在這種智慧當中，卻缺少了性格和達到一種目標的意識；牠是游移於學

說與方法兩者之間，僅僅注重着一點：成功。在一本名爲『國社黨』(Die Nazi-Sozi)小冊子裏面，戈培爾描寫在一個狄克推多與兩個議院指導下之未來的國社主義政府，這兩個議院：一個是職業議院，一個是具有二百名經狄克推多選取的終身議員之參議院。遇到這個參議院議員有死亡時候，則用選擇方法補充遺缺；此外，參議院還選出一個指導政治的總理大臣。這個計劃幾乎是白天的夢想；在未來的政府裏面，將是『總理大臣』戈培爾，在『狄克推多』希特勒的命令之下，擔任實際的指導權。

戈培爾并不是天生的政治家；他缺少了相對的觀念，也缺乏了希特勒的辯證法。然而，靠着他的熱烈的性情，他具有對於人的精細的認識，及對於他們所可使用的地方；他最接近的左右是包括着忠實的信徒及勝過希特勒所有之精選的同事；他是富於被人錯認歸屬於希特勒之鼓動情感的；雖然他的性格和他的口氣遠不如希特勒所有的那麼接近羣衆，但他懂得利用這種隔離的情況而作幻惑的工夫。國社黨的宣傳之採用一種英雄故事的格式，其功績是屬於戈培爾的。希特勒援引德意志各英雄現身來世，而在戈培爾看去，這些英雄已經在那裏了；當他在他的干預

報(Angriff)裏寫到挺進隊前進於紐哥倫(Neukölln)之沈寂的和淋溼的街道時候，他儼如談歷史上有名的希臘戰役一樣，而沒有一個國社黨的烈士能像柏林學生何斯特·維塞爾(Horst Wessel)之那樣被捧為英雄的。他是不喜歡簡單的；向魯爾黨區的同志通知他要離開他們，他并不乾脆的說他是被任為柏林黨區領袖，而卻說：『骰子已經擲下來了，他們已作違反你們和我個人願望的決定了。』而他并不像一般人買張車票，於七點四十分，下柏林動物園車站，而卻說：『我懷着萬分愁悶，摺疊我的帳篷，到這幾行字遞到你們手裏時，無情的輪船已經把我運到柏林之地瀝青的荒漠去了。』這裏可以看出，即是穿着旅行服裝，他也要裝出英雄的模樣。他想總有一天，有人站在防禦物上高唱國社黨黨歌，但他并不這麼簡單的說出來；而卻說：『牠的（黨歌的）音調總有一天成為爭取自由的防禦物上之革命呼聲。』因為要說明先需要佔領街市然後再攫取政權，他便說：『街市的樂音乃是政權之最接近的期待者。』

假定這些話製成詩歌，將更見好看了。

然而，假定這種格式可以充分描繪戈培爾的本色，這便是完全根據這種大言而下斷語，結果

卻是有負他這個人物了。戈培爾以一八九七年生於來因蘭；同他的良心相抗戰，他是先從他的宗教環境解放出來的。他因獲得大亞爾伯 (Albert-le-Grand) 天主教協會的助學金，而得以完成他的學業；七個大學曾經受過這個不安分的學生的光顧；他隨習日耳曼文學和文學史的功課。他是天生的作家。與其說他具有確實豐富的思想，不如說他具有一種包羅許多學識的思想，他尤其是缺乏平衡力及從這種平衡力產生出來的特質：機敏，興趣。在他的心坎裏，有着一種探索的精神；在那裏面，懷疑是明顯的強烈過於任何信仰。

照他自己說，他曾於一九二三年，在被佔領的區域內，設立一個國社黨地方支部，因為了這一個，他曾被比國人摔進牢獄裏去。可是，在另一次，他冒稱說，曾因為做有利於興登堡的候選的活動而身受牢獄的處分，他還補充說，在這一次他被人用馬鞭毆擊。因為這種前後說話的矛盾，黨裏面同志常常公開控告他撒謊，他自己也并不提出抗議。無論如何，這是使人驚異的，因為一九二三年之人民觀察報對於黨之纖微的收穫都記載無遺，何以不曾提起來因蘭新支部，也不提起後者的創辦人呢。戈培爾曾寫有幾本文學的小說和幾部無價值的劇本，這些作品便可作他之信仰的懷

疑和他之反抗宗教的與精神上的關係之明證。這些作品不但是非社會的而且是非政治的作品。戈培爾曾完全修竟他的學業，並且很合規則的得到他的博士學位；但是在不能消化所得的知識這一點上，他還是更有甚於希特勒。他的演講和他的文章或許是最沸騰的和富有理想的，但同時是最缺少經過沉思的實質的；希特勒至少還得某一方面專門的學識：關於外交政治方面；在戈培爾胸中，我們則看不見任何實在的知識。

這樣，在希特勒之後，黨之最良好的活動者是——同希特勒一樣——一個天生的流浪者；不過在這種性質上，後者是更有甚於希特勒的。他是黨的一個真實不虛的巧言者。他可以做出絕妙的表現；譬如，他可以說現在有一種『小勞動者』的模型構成出來，這個『小勞動者』可以大大方方的同『小資產者』相比較，因為人們若能慣於饑餓同慣於饜飽一樣，他便可變成『小的』了。隨後，他猛然擁抱勞動者們大聲呼道：『新勞動階級的年少的貴胄，你們站起來吧！你們是第三德意志的貴族啊，你們用熱血所播下的種，將來長出燦爛的收穫。你們握着拳頭，擡起頭來！打倒德謨克拉西式的平等，它是少年勞動階級到完成其歷史上任務的道上之障礙物啊。』這些話是發

出純潔的聲音嗎？當戈培爾稱呼勞動者爲他的同伴和他說到『以模型給與無產者的粗野性』的時候，好像一個濃裝豔抹的女人擁抱一個革命的水兵一樣。

他所說出來的話，多少是從一種可敬的情緒發出來的，然而不是一種誠實的情緒：『人在與生涯糾纏時候，他便不是自由的。』這句話是極正確的。可是戈培爾博士應當進一步說他自己也稍爲缺少這種自由。很快的，柏林的信徒紛紛傳說『博士』不常常是極勇敢的。

『在旅行時候，我不佩帶黨徽；我很少感覺到與他人作政治談話之用處與必要，』他這樣承認說，雖然全國宣傳部長恰好命令佩帶黨徽。在人民觀察報裏面，有許多篇認得出是屬於戈培爾筆法的文章，使我們看到他遇過『意志薄弱』的同胞的強暴行爲。有一天，他從醫院出來，碰到一批共產黨準備打他，警察來到，使動『這個共和政府的象徵：』橡皮棍，他纔脫身走出。又有一次，乘坐汽車行駛時候，他現出確實有雙層眼光的天才：『忽然間，』不知名的編輯敘述道，『戈培爾博士從他的座位站起。停住！車夫同志，停住！汽車停住了。博士，有什麼事情發生？車夫問道。——不知道什麼，但我們碰着危險事情啦！抽出我們的手槍，跳落地上。不要作聲。看不見任何人啦！我們巡繞汽車

看，四個橡皮輪是全部鼓漲並沒有傷損。啊，這是什麼？不錯的，左邊後輪短了四個螺絲圈，五個螺絲圈裏面，短了四個。一番無恥的與奸惡的陰謀。猶太人及其走狗是這樣的做鬭爭。這個便是他們的聰明的武器呢……」

國社黨其他的領袖，并不會不遭遇危險。斯特拉塞於某一次衝突後，還會臥床好幾個星期呢。然而他們沒有一個認在黨的機關報裏敘述這種事變是很漂亮的辦法。所以斯特拉塞於一九二七年四月底在他的柏林勞動報裏面，用極鄙視的態度宣稱說，在前線的鬭士間，不應當利用某某種事件來做個人的宣傳，也不應當不斷的使人談到他個人身上。

有一個人，未來之柯尼斯堡黨區領袖，愛尼克·高克 (Erich Koch) 曾於愛伯斐爾 (Elberfeld) 認識戈培爾，他在斯特拉塞的機關報同一號裏面，發表一篇談「種族混合的結果」的文章。這篇是在表面上絲毫不懷惡意的「科學的」研究，目的祇在證明彎曲的腳是代表不可與以信任的人物：「當心帶有特殊記號的人物呀！下薩克森的一個俗諺是這麼說的。因為通俗的經驗曾經證明出種族混雜所發生的危險結果。英國之李察爾第三 (Richard III) 是駝背和跛腳的，路

易十三瘋王是殘廢的，達來命 (Talleyrand) 是具有特別錯誤之性情的。

『我們勉強可以用這個字眼：那一種的人便有那一種的性格。他可以眩惑人們，可以大肆誇張，可以散放虛偽的消息，可以很不道德的利用他之同事們的忠忱，想榨檸檬汁一樣榨取他們，隨後便榨走他們，藉使他自己可以收穫他們工作所得的利益。他同時熟悉譏謗，暗算和口是心非之種種卓絕的技術。』

當然的，這些歷史的追述無非是針對柏林黨區領袖而發之一種粗鄙滑稽的嘲笑，而這位領袖的亞利安的種系是大大發生疑問的，並且因為他的不良性格，他便受了人們的憎惡：『我們無須再作這些引證了！它為我們指出種族混雜和種族退化之可怕的结果。因為種族的關係而生出之精神上與肉體上殘廢的人們，往往具有起初可以惑人的各種才能；然而這些才能是像一顆燈泡，當牠走電時候，在永遠黑暗之前，射出強烈的光線那種形狀。事實上他們是聰明的人物，但又是無情的利己者和野心無度的人物；總而言之，他們從來祇有是有害於民族的。』

二 爭奪柏林的激烈鬭爭

戈培爾之在柏林辦理宣傳事業，所用的方法其粗俗的程度實不下於斯特萊撒；他於一九二七年九月在預報上面寫道：『國社主義者們！你們不要相信住在某街門牌十四號二層樓的某君……他是你們之最危險的虐待者中之一個。』而幾天後，他用同樣的方法激動閱者反對另一個敵人。假定經過這種辦法後，甲君或乙君被人毆擊，預報對此是毫不相干的；牠不過使閱者當心而已。雖然如此，戈培爾之感動他的聽衆，其深刻程度實遠在黨中任何其他演講者之上，而且遠在現時代任何其他政治家之上。他向年輕的無產者們說話，直使他們在無產階級的皮膚裏面都感覺舒服；使他們拒絕一切哀矜的情緒，而祇夢想着光榮與勝利。

國社黨在柏林的候選區域爲斐力德羅 (Friedenanu) 和斯德格尼赤 (Steglitz) 之資產階級的市區。從前爲德意志國民黨的采地；到一九二七年後，國社黨從這兩個市區侵入北部無產階級的區域。在好幾年中，東部市區仍然不讓國社主義者進去。反之，在法露斯 (Plattis) 大廳和

博克 (Bock) 酒店，他們大打敗共產黨人；戈培爾便使這兩次鬪爭在國社黨的歷史裏面名垂不朽，正如希特勒關於何夫博羅的鬪爭所做的一樣。如果柏林的信徒談到公館街的鬪爭——在那裏面并且犧牲了十四個國社黨員——他們僅是用一種勉強的態度；但是在來往郊外的火車裏面所發生的幾次衝突，竟然極其迅速的構成一段故事了。到了兩年後，人們遇到提起『運動的開始』時候，大家絲毫不想到何夫博羅的鬪爭和十一月九日的暴動，而祇想着『里克脫斐德 (Tichardfeld) 的鬪爭』了。而黨領袖儼然不是希特勒而卻是戈培爾了。有人在希特勒面前表示不平，他回答說：『國社主義在此地或在彼地染上地方的色彩，這是不很壞呀。』

三 戈培爾之不合法的行動

但是，柏林黨區領袖又另一次使希特勒失望。

戈培爾到了柏林之『地瀝青的荒漠』到了『部下的公館』抱着大幹特幹的希望。他於一九二七年創辦『預報』，後者是一張週報，他想用着粗野的方法，靠這張報來同斯特拉塞的柏林勞

動報競爭。他在街上和會裏面做挑釁行動，因為，照他自己說：『在外面用着恐怖行爲和激烈行爲以堅持他的哲學的人，他總可以有一天獲得權力，並且同時獲得顛覆政府的權利。』他便這樣做去，做到好幾次在酒店和地道車裏面發生鬪爭後，柏林警察當局便於一九二七年五月禁止國社黨在柏林及其四郊的地面活動。希特勒正於五月中在柏林的一個非公開的會中，對着幾千聽衆演講，而他祇希望能夠從新在普魯士公開演講，因此希特勒對於他的戈培爾博士之笨拙行動大見不滿了。

因為，在希特勒那方面，他漸漸做到和新當局重新建立可以相處的關係。巴伐尼亞政府已於一九二七年三月初廢除禁止希特勒公開演講的命令。希特勒於事先會須經過國社黨議員布特曼之居中接洽，向內務部長保證說：『……國社黨不追求任何違反法律的目的，而他也不使用任何不合法的手段，以求達到他的目的。』此外，國社黨各首領還須答應不使如挺進隊或衝鋒隊各種組織帶着軍事的或警察的性質。

希特勒一切都肯同意，祇要對方許他演講，因為國社黨之能擴大起來，實倚靠着希特勒的演

講，而不是倚靠着斐佛的軍事把戲。

四 從右翼政黨來的生力軍

其他聰明的人物也承認這個事實。「我無條件的服從亞多爾夫希特勒先生的命令。爲什麼呢？因爲他曾證明出他是懂得指揮的。」這篇寫於一九二七年一月多少有點誠懇的宣言，其作者不是別人，而乃是從前在開會時候受過希特勒搗亂的烈芬德羅伯爵。

在個人方面，烈芬德羅是反對『代表大地主之潛伏的資本主義的』傾向的，在國家主義的運動裏面，烈芬德羅曾夢想一個受他同斯特拉塞的指導之國社黨。但是斯特拉塞使他明白了有利的合作是不可能的，假定伯爵不先向『慕尼黑的教皇』投誠。因此，烈芬德羅便同希特勒談判，到了對於希特勒同羅馬方面串謀的問題，他鄭重聲明贊同後，他便加入國社黨，而他的國會議員位置也經對方保證給與他了。過幾天後，另一個民族派議員，司托爾（Stöhr）在同樣的條件下，也加入國社黨。這兩個人都增強了斯特拉塞的羽翼，烈芬德羅并且支持斯特拉塞的外交政策。在下

一次召集於努連堡的國社黨大會中，他宣佈說：『大家不要忘記我們是國社主義者，所以我們不應當追隨一種做或可以做資本主義的利益之工具的政策。』德國共產黨人也可以說：我們擁護蘇維埃聯合國呢。

希特勒所得到這種民族派的生力軍，其成分不是十足的。他之仍然樂意收納這些靠不住的徒弟，便可證明出他有在數目上發展之必要。在那個時候，在政治的重要地位上，鋼盔團甚至於德意志青年黨都超過於國社黨。

五 軍人維持費之浩繁

希特勒若不願意放棄一切政治的前途，那麼，他也應給他的黨徒以一種軍事的組織，使後者不僅做牆上貼紙條或替人民觀察報做廣告的工作。因為這個原因，所以他忍受斐佛的軍事的把戲，雖然他是實在不喜歡這個。約在一九二七年中間，斐佛擴展挺進隊到了很好的程度，使後者，否則在人數上，至少在活動上，可以與鋼盔團相抗衡。八月二十一日，國社黨開大會於努連堡，差不多

有二萬挺進隊隊員在會前列隊遊行，即是比較前一年，挺進隊人數是超過三倍了。到這個時候，希特勒便可以宣佈說：『我們再不要同時跨在其它軍事團體的黨徒了。』可是在一九二五年，這種跨名的辦法可以隨便做。從一九二七年起，這種辦法是被禁止了。

在這一次大會中，希特勒於向挺進隊舉行授旗典禮時候，以類似有歷史性的任務付託各隊。每隊各有各的任務。對來因蘭支隊，他說：『你們掌起這面旗，直到德意志的萊茵河重複歸還德意志之日為止。』對維也納隊的掌旗說道：『你接受這面旗，視牠猶同我們的運動之固結的單位的象徵，直到那些不道德的凡爾賽條約和聖日耳曼條約被我們撕碎之日為止。』他還尊稱愛森的人們為『德意志帝國之世傳的武庫之代表人。』

在慘淡的威馬爾大會後，努連堡的列隊巡行，還不能使人感覺快感。挺進隊的功績首先是屬於斐佛。他做到將所有未曾加入鋼盔團或猛狼會（*Wervolf*）之舊日前鋒隊（*Frontbann*）的逃亡份子吸收到挺進隊來。這種辦法當然很費金錢，而國社黨的經濟來源還是最微薄的；這些經濟來源幾乎全部費在挺進隊身上。譬如戈培爾於一九二六年到柏林時候，幾乎是囊中不名一

文——而他已經是一個有名的活動者。所以努連堡大會注重尋求新的經濟來源。於是組織有資產的黨徒和同情者的團體，名爲『奧斐林格』(Opferlinge)，牠的份子須按期捐出很重要的款項。

此外，並請所有各黨員都特別捐助兩馬克；在希特勒發言的大規模的演講會裏，包箱的票價取費極昂。靠在奧斐林格各黨區的領袖，不久便可在比較舒服的條件下進行工作。在一九二七年，戈培爾已經可以坐在一輛馬力強大的汽車裏面馳騁柏林道上，而干預報當談到有一次宣傳活動時候，曾誇獎這輛汽車的華美，牠說（而且好幾次提起汽車的招牌）：『精神勃勃地在大隊前頭前進，像一個大灰色老虎一樣。』

六 斯特拉塞之再度擡頭

國社黨需要金錢的援助；加之，自挺進隊的組織佔據了各人的精神後，黨的組織便爲人所忽視了。這種狀態延長下去，便將成爲一種危機，因爲它將鞏固斐佛的地位。組織部長亨涅曼將軍

——一個多病的人——現出他是不能勝任他的任務。因為不能以他的意志壓倒他的幾個部屬，他便辭職不幹了。亨涅曼的退休實爲斯特拉塞方面的勝利，斯特拉塞便於一九二七年取得亨涅曼的位置。同時，黨從普魯士邦議會議員孤白（Kube）身上，得到一個新的援軍。孤白同烈芬德羅與司托爾一樣，是屬於斯特拉塞的朋友團體裏面；他在某時期中極力反對戈培爾，甚至於請求警察的援助以對抗柏林的國社黨人。他自然是斯特拉塞的同盟者了。衝鋒隊現在是受斯特拉塞的一個舊同事與姆勒（Himmeler）的指導，斯特拉塞因而在衝鋒隊裏面得到另一個的援助。到一九二七年年底，斯特拉塞在黨中的地位，又到了他在希特勒領導下所能做到的那麼堅強的程度。在班堡的失敗之二年後，他終於得到很愉快的擡頭。

七 選舉鬭爭之失敗

雖然有挺進隊之耀武揚威和演講會的成績，一九二八年五月二十日的國會選舉，卻指明出國社黨仍然是很少政治的重要地位。

這次選舉給與國社黨的全國票數爲八十萬七千票，至於格拉夫的民族派競爭者僅得到二十六萬五千票。從此後，希特勒在國會裏面有着十二個議席，以代替上屆的七個議席；但在一九二四年十二月，他曾得到十四個，而在同年的五月，三十二個。在普魯士邦議院裏面，他得到六個議席，以代替上屆的一個議席；在巴伐尼亞邦議院裏面，他得到九個議席，以代替上屆的六個。然而這總不過是一九二四年的數目之三分之一而已。經過這次選舉後，國社黨似乎是極不足畏的，因此，在同月的三十一日，禁止柏林國社黨黨區活動的命令是廢除了，而幾個月後，又許希特勒在普魯士演講。

在這十二個議員中，除了愛勃將軍——他已加入國社黨并且立刻被選放候選人名單的首位——僅有兩個希特勒的心腹：烏施拉的首領培克和戈林，後者已從外國回來。戈林現在同羅森培（他對羅森培還懷着強烈的憎惡）又成爲希特勒之親密的顧問；靠在他的社交生活的興趣和他的各種關係，他很快成爲練達的議員，成爲與非國社黨的，資本家的，甚至於猶太的，各種社會之中間聯絡人。

他個人之對於霍亨索倫皇室的信仰，使他同廢皇太子接近；廢皇太子雖然從來不曾隸屬於國社黨，但他同戈林與戈培爾在黨的內部構成某種勢力；這種關係延長到一九三三年，直到戈林和戈培爾反目之日爲止。他們聯盟的目的，大半是爲着排擠格列戈爾·斯特拉塞——希特勒之下的最有力的人物——并且盡力量打擊佛力克的勢力。

八 丁脫之被開除黨籍

在一九二八年的選舉後，沒有一個國社黨人會想到國社黨，在一年後，會變成德國第二政黨，而在二年後，會變成德國最大的政黨。人們心中產生紛亂的情緒，以爲國社黨不會走上正當的途徑。領袖們便覺得他們最迫切的任務是在於改造黨員的性情，使他們明白炸彈和機關槍的時代已經過去，但仍然維持着他們奮鬥的精神和軍人的忠忱。

在是年八月三十一日的大會中，希特勒於開除屠麟根黨區領袖丁脫博士之下，得到鞏固他的權威的機會。丁脫曾請求設立一個諮詢會以佐助黨領袖。他還且贊成由希特勒任命諮詢會會

員。然而一個會總是一個會，總要牠選出一個主席來。

希特勒便以譏笑慢罵的怒潮掃去這個提案。諮詢會這種機關，對他是毫無利益的。他從來不向不曾擔負一種任務之完全責任的人物請教。他若要探問關於國會的消息，他便找佛力克（他不說找斯特拉塞）；關於挺進隊，他找斐佛。這個提案終於被擯絕了。丁脫又不謹慎而在會中談到新的宗教學說，遂被開除黨籍，而希特勒便大聲喊說他不讓黨變成宗教的或哲理的爭論戰場。

九 國社黨的改組

這次大會的實際結果，實爲國社黨之全部改組。從十月一日起，國社黨分爲二十五個黨區，與德國的選舉區域相符合。魯爾黨區原爲斯特拉塞的勢力之大本營，現在被解散了——這對於希特勒，實爲政治上一番勝利。

希特勒永遠以保障個人的權力爲慮，於是聯合巴伐尼亞各黨區成爲一個，其指導權由他保留在自己手裏。對於國社黨奧大利支部，他握有與上面相同的最高權威，這是根據一九二六年的

國社黨議決案，那裏面決定黨的最高指導機關擁有將『所有受德意志民族統治之國家』的參加者歸併入國社黨的權利。基於這個議決案，國社黨正式放棄了蘇特的國社主義者；那麼，希特勒是格外注視與奧大利人合併了。因此，他重傷了他之舊日同胞的國民自尊心；而因為這個事實，他身受責罰，奧大利的國社黨在好些年中絕不會有所發展。

十 附屬的組織

從一九二八年起，一大批附屬的組織產生出來。爲首中之一個——挺進隊除外，牠站在另一種地位——實爲『國社主義文化鬭爭大同盟』，爲羅森培根據一九二七年努連堡大會的一個議決案而組織的。

在原則上，黨無須組織一個國社主義公務員聯合會。它尙且壓制那些熱心過於能幹的黨員嘗試這一類的工作。它認爲不要與那些公務員爲擁護本身的利益而組織的大職業團體競爭。它知道這種態度可以格外得到他們的同情。在一九二三年年頭，希特勒已經表示『他從來擁護公

務員的權利而反抗敵人的侵犯與攻擊。』一九二六年威馬爾大會會照佛力克的提議決定擁護『公務員的權利，悉按憲法所給與他們的保證。』為取得公務員的同情起見，國社黨竟不惜承認威馬爾憲法。

不過，公務員中至少有一類受到國社黨人的注意，這便是學校教員了。在一九二九年年頭，於未來的國會議員漢斯·謝模(Hans Schemm)的領導下，成立一個國社主義教員協會(Nationalsozialistische Lehrerbund)到一九三〇年的選舉後，這個協會有着廣大的發展。另有其它協會的組織，使國社黨得伸張勢力到最重要的職業裏去：德意志國社主義法律家協會(Bund Nationalsozialistischer Deutscher Juristen) 成立於慕尼黑，組織者為國會議員漢斯法蘭克第一律師；國社主義醫師協會(National-sozialistischer Arzte Bund) 成立於因哥斯達特(Ingoistadt)，組織者為里伯爾博士(Dr. Liebel)。

此外，直到這個時候，德意志婦女協會對於國社黨多少是獨立的。到一九二八年年頭，它被國社黨吸收進去，而採用『紅色卍字會』(Rotes Hakenkreuz) 的名稱。這個名稱充分表示婦

女們祇承認擔任看護的工作，而不是站在男子旁邊共同奮鬥。因為要使任何疑義均無發生之可能起見，紅色卍字會主席愛爾斯伯·山德女士曾於一九二八年在慕尼黑召集的國社黨領袖大會裏，宣稱國社主義的婦女祇想擔負『伺候』的工作，支持挺進隊的作戰，而不要求政治的平等待遇。

此外，還有『希特勒青年』(Hitler-Jugend)的組織，它的首領孤爾特·格魯伯於一九二八年九月進入國社黨最高領導機關。還有國社主義大學生協會成立於一九二八年十一月，指導者爲恩忒博士(Dr. Adrian von Renteln)。

在所有這些附屬的組織之中，最擁有勢力的——這種勢力縱在希特勒主義崩潰後，還能支持數十年之久——便是德意志國社主義學生協會(Nationalsozialistische Deutsche Studentenbund)了。一九二八年，在某爾(Kiel)城，一個國社黨員第一次充當大學全體學生代表會的主席。這個國社黨協會極力鼓動德國學生團體的反猶太的情感，其實它們從來不曾缺少這種情緒。在它的新領袖西拉克(Baldur von Schirach)的領導下，它的勢力迅速發展，而且一

種新的空氣瀰漫各大學校。至於從前，譬如有任命猶太教授的事件發生，學生們僅向校長呈遞恭敬有禮的抗議書。從此後，如有這一類的事件發生，大學校即陷於革命的狀態。國社黨員現在開始在講堂裏高聲吵鬧，並且在學生大會裏互相毆打。

在一九二八年，支持這種附屬組織之龐雜的關係網者，也不過六萬人。國社黨之擴展的速度是緩慢了，因為從一九二六年到一九二七年，人數不過從一萬七千增加到四萬。這些附屬的組織之擴張，結果竟成爲一種危機。斯特拉塞於一九二九年，希特勒本人也於一九三〇年，都曾指點出來。到了羅姆於一九三〇年年底主持挺進隊的領導，並且照他本人舞弄官樣文章的癖性而加倍增多各種章程與條例，於是國社黨變成了一片叢莽，在那裏面，或許連它的領袖也不復認識自己了。

